

# SGRA REPORT

SGRA报告 No. 96 中文版

## NO. 96

ISSN 1346-0382

第66届 SGRA 论坛

## 第六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关口全球研究会

## 第六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

### ■ 举办主旨

本“国史对话”项目的目的是促进各个国家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 2016 年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5 届。诸多参与者跨越国境齐聚一堂，围绕各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与挑战、个案实证研究展开讨论，深化了交流。第 5 届正值全球性新冠肺炎肆虐，仍秉持着应继续对话的方针，首次尝试线上举办，虽然众多与会者的发言很有意义，收获甚多，但也因讨论时间较短，对内容的吸收理解略显不足。本次会议在以往经验上做出新的尝试，以时间充足的自由讨论为主，大胆设定了更大的主题。此次会以问题提出与几则评论为开端，充分展开跨越国家、地域、时代的讨论，以期进一步深化一直以来不断扩大的与会者的交流网。

为促进对话顺利进行，会议安排了中日、日韩、中韩语言的同声传译。

### ■ 问题提出

“从人的移动看近代日本：国境·国籍·民族”

从古至今，跨越国家和地域的人的移动一直都存在。但是，当历史以国家为单位、被作为国民的历史书写时，移动者的经验便会从历史中遗漏。那么反过来说，在围绕历史进行的对话当中，可以说人的移动足以成为最优选的话题之一。

关于“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这个主题，我将在问题提出部分以近代日本的经验为素材提出论点。导入部分，我会先基于报告者对美国的冲绳系社区的实地调查对现代世界中的民族集团（ethnic group）作一概述。

第一个问题以近现代左右人的移动的国境和国籍问题为焦点。作为具体事例，我将介绍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统治下的冲绳和朝鲜以及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冲绳的对外移民状况。我想指出，国境和国籍与近现代的主权国家体制和国际政治结构（帝国主义和冷战）密切相关。

第二个问题将关注跨越国家和地域的民族集团的形成、以及不同于国家间关系的民族间关系的形成。这都是人的移动对政治、社会秩序产生的冲击。作为具体事例，我将探讨 20 世纪上半叶在夏威夷的日裔居民与华裔居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就近现代的人的移动与前现代有何异同，以及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时会有何发现等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盐出浩之（京都大学）

## 关于 SGRA

关口全球研究会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SGRA) 以推动实现良好的地球市民为目标于 2000 年成立, 因渥美国际交流财团所在地东京都文京区“关口”而得名。SGRA 以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从事研究活动的渥美奖学生的外国学者以及日本的研究者为中心, 为应对各种现代课题而进行研究及献策, 并通过论坛以及报告书等形式公诸于社会。SGRA 以开展领域广阔的、国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为愿景, 推动多国籍的研究人员广集智慧与人脉, 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 展开分析和考察。

([www.aisf.or.jp/sgra/chinese](http://www.aisf.or.jp/sgra/chinese))。

# 第六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 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

时 间 | 2021年9月11日（周六）上午9点~下午3点20分（北京时间）  
方 法 | 线上  
语 言 | 使用中日韩三语同声传译  
主 办 |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第1场 [总主持人：李 恩民（樱美林大学）]

【举办主旨】	引言	5
	村 和明（东京大学）	
【问题提出】	从人的移动看近代日本：国境·国籍·民族	8
	盐出浩之（京都大学）	
【指定讨论1】	13-14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的人的移动	19
	韩国：赵 阮（釜山大学）	
【指定讨论2】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移动	21
	中国：张 佳（复旦大学）	
【指定讨论3】	古代及中世日本的出入境管理	25
	日本：榎本 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第2场 指定讨论 [主持人：南 基正（首尔大学）]

【指定讨论4】	近代韩国人的移动	28
	韩国：韩 成敏（世宗大学）	
【指定讨论5】	从中心到边缘——关于“佐米亚（Zomia）”概念	31
	中国：秦 方（首都师范大学）	
【指定讨论6】	帝国、人权、南洋——政治思想视角下的思考	33
	日本：大久保健晴（庆应义塾大学）	

	<b>回应指定讨论者</b>	36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b>自由讨论 1</b>	38
	讲师与指定讨论者	
<b>第3场</b>	<b>自由讨论 2</b> [主持人: 彭浩 (大阪市立大学)]	45
	论点整理: 刘杰 (早稻田大学)	
	成员 (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市川智生 (冲绳国际大学)、大川真 (中央大学)、佐藤雄基 (立教大学)、平山升 (神奈川大学)、浅野丰美 (早稻田大学)、沈哲基 (延世大学)、南基玄 (韩国独立纪念馆)、金罔泰 (全南大学)、王耀振 (天津外国语大学)、孙继强 (苏州大学)	
<b>第4场</b>	<b>自由讨论 3</b> [主持人: 郑淳一 (高丽大学)]	60
	成员 (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市川智生 (冲绳国际大学)、大川真 (中央大学)、佐藤雄基 (立教大学)、平山升 (神奈川大学)、浅野丰美 (早稻田大学)、沈哲基 (延世大学)、南基玄 (韩国独立纪念馆)、金罔泰 (全南大学)、王耀振 (天津外国语大学)、孙继强 (苏州大学)	
<b>总结</b>	宋志勇 (南开大学)、三谷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70
<b>闭幕致辞</b>	赵珖 (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74

**讲师简介** 76**代后记**

金罔泰 78、三谷博 81

**参加者名单** 83

## ※ 同声传译

日语⇔中文: 丁莉 (北京大学)、宋刚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韩语: 李惠利 (韩国外国语大学)、安暎姬 (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韩语: 金丹实 (自由职业)、朴贤 (京都大学)



# 引言

村和明

东京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感谢大家从世界各地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有人是在深夜的美国剑桥参加，我向各位深表谢意。现在由我来对今天的会议主旨作一简单介绍。

本“国史对话”项目这次的举办已是第6届，它以向研究各自国家历史的专家们提供跨国交流的平台为宗旨，在世界以及亚洲各地的城市举办至今（请参考第6页“‘国史对话’项目历程”）。

之前大家曾相聚于北九州、首尔、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数日同住一处进行学术探讨。本项目就是以这种形式开展至今的。特别是去年1月在菲律宾举办之后遇上了火山喷发，导致大家无法顺利离开菲律宾。大家有了这样共患难的经历，更是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联结，对此大家仍是记忆犹新。

但那之后，因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之前大家相聚某处的举办方式变得难以实现了。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希望继续对话，于是开始尝试线上举办的方式。

今年1月我们用线上会议软件，以正当时的传染病为主题举办了半日的线上对话。当天有非常多人参加，得到了非常多的宝贵意见。但当时时间不够，没能提供充足的讨论时间，虽然很多有意思的意见被提了出来，但没能将讨论深化拓展下去。大家各说各话，发言者说罢话题便终结了，当时留下了这类问题。

这次会议活用上次的经验，继续以线上方式举办，但不是以历来事先准备好多个详细报告内容的方式，而是以确保充足的自由讨论时间为侧重点编排了本次会议内容。我认为这是一次稍具实验性的尝试。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状况下，在各位的国家以及各位所居住的国家 and 城市，历史学研究现在也正面临着巨大挑战。虽然大家肯定都因此正在遭受痛苦，但我认为也是有些许好处的。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线上方式使得会议举办变得更轻松，大家也更容易参加。因此也就更容易去进行一些稍具实验性的尝试。比如说，邀请各位齐聚某个城市3天来进行实验性的会议尝试是件令人担忧的事情，但线上的话却能够实现，本次的策划即是如此。

邀请大家一起进行讨论，就需要提出一个大的主题。考虑到“国史对话”项目的宗旨，以及现在的现实状况，我们确定了“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这个主题。

像现在这样我们的移动受到如此严重的限制，在近代之后是很罕见的，很多人都对此重新进行了思考，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状况。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一个可以跨越时代与地域进行讨论的主题，希望通过大家共同思考，可以将这次会议打造成强化一直以来参与国史对话的各位以及这次新参与进来的各位之间联结的交流平台。我发言之后，首先会邀请京都大学的盐出浩之老师提出本次会议主题，盐出老师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请他以日本近代的事例为中心谈谈会议主题，为我们的讨论揭开序幕。

之后，会请中日韩三国各两名研究者做指定讨论和点评，每人发言10分钟。因为时间的关系，在此我就不对各位做介绍了。

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发言者就是这几位，之后会请各位自由发言讨论。第3环节和第4环节中由谁按什么顺序发言，没有事先规定，所以请各位能充分自由讨论，将议题深化发展下去。

今天的实验性尝试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全靠在场的每一位。所以请各位指定讨论者、各位小组成员都务必积极发言，将议题的讨论深化发展下去。希望这次会议可以成为各位交换和共享想法、跨越国境寻找对自己的研究而言持有重要或有趣见解的人的平台。

关于其他与会者，由于线上系统的特性，各位无法直接出声发言，对此我深感抱歉。如果各位有想表达的见解的话，可以用聊天功能，但能否将之加入会议讨论，要看主持人的判断，还请各位谅解。

最后一点，刚才会议总主持人李恩民老师也提到了，是关于翻译的注意事项。

对于本项目来说，同声传译的流畅程度至关重要。本“国史对话”项目的强项，在于拥有非常优秀的同声传译团队的支持。因为今天的会议安排构成，本次同声传译的强度比以往更大。会议中有很长时间是没有决定发言顺序与内容的，而且是在线形式，大家都看不到同声传译者，很容易忘掉他们的存在。之后各个环节，主持人应该还会再三提醒大家，希望各位在发言时能意识到自己的发言正在被同声传译成其他两国语言。所以发言一定要缓慢清晰。还有就是开始发言前要先说明自己使用哪国语言进行发言。

我现在说话的时候也在尽量提醒自己要放慢语速，所以我再强调一遍，各位发言时请意识到各位同声传译者的存在。

今天会议时间比较长，大家要盯着电脑屏幕画面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但还是希望各位能积极发言。我对本次会议主旨的介绍就到这里。

#### ■ “国史对话”项目历程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于2015年7月举办了第49届SGRA(关口全球研究会)论坛，讨论了“东亚公共财产”和“东亚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通过讨论确认了，首先我们要在东亚建立“知识共享空间”或“知识平台”，之后向东亚提供和解型策略的意义。

2016年9月以第3届亚洲未来会议为契机我们举办了首届“国史对话”，“国史对话”平台就是这样诞生的。迄今为止三个国家的研究者之间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对话，但能左右各国历史认识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充分，从这一意识出发，我们首先探寻了可能让东亚历史形成对话的条件。具体是通过三谷博老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葛兆光老师（复旦大学教授）、赵珖老师（高丽大学名誉教授）的报告演讲，探讨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国史”如何处理亚洲的问题。

为从结构上理解本国史与国际关系，第2届国史对话设定了“蒙古来袭和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的主题。2017年8月在北九州，来自日本、中国、韩国、蒙古的11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一起，从各国国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报告后，从东亚历史的角度，对朝贡册封、蒙古史与中国史、资料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此次会议的多个报告都表明，只要关注东亚整体的动向，不仅能看出国际关系，还会找到能更深入理解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线索。

第3届国史对话进一步将考察时间往后推，设定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议题。2018年8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9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首尔，讨论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和满洲的皇太极各两次入侵朝鲜，以及其背后以银贸易为主轴的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战乱后的安定问题。另外，为回顾这3届国史对话，还进行了由早稻田大学主办的“面向和解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交流网的考察”的小组讨论。

第4届对话的主题是“‘东亚’的诞生：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2020年1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国史研究者聚集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围绕各国的“西方认识”，“挑战传统和创造传统”，“跨国界人的移动”问题进行了报告和广泛的讨论。

第5届对话以“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应对”为主题，由于新冠疫情2021年1月于线上举办。会议思考了各国在19世纪如何认识传染病问题，提出了怎样的应对对策，并探讨了各国的相互协作情况及其局限性。除了来自各国的论文报告外，还有非常多的前4届会议的与会者以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因为新冠疫情不得已在线上举办，但是我们因此而建立了线上的研讨会平台，促成了一次有意义的对话。

## 问题提出



# 从人的移动看近代日本：国境・国籍・民族

##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大家早上好。首先，我想用大概 30 分钟的时间来提出会议讨论的主题。我的题目是“从人的移动看近代日本：国境・国籍・民族”。我想主要谈谈近代日本的事例，希望能为接下来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对话提供线索。

刚才村老师在开幕致辞中也提到，现在跨越国境的移动变得非常困难。我想哪怕只是为大家营造一种跨国旅行的氛围也是好的，所以想以田野调查收集的照片为依据，从“人的移动关乎民族”的具体事例开始谈起。

照片 1 是 2014 年 1 月我去美国洛杉矶时拍的中国城入口的景象。

为什么要从这个中国城开始讲起呢，是因为在洛杉矶同时存在日本城、中国城和韩国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中国城很大，里面有不少华裔美国人的社区，也有很多商店和餐厅。



照片 1

照片 2 是洛杉矶韩国城里的一家餐厅。餐厅里摆满了韩国料理，韩语也被正常使用。很可惜我没有拍到好的照片，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城，但实际上地方很大。洛杉矶韩国城规模很大，现在比中国城还要生机勃勃。

照片 3 是被称为小东京的日裔居民社区的所在地。与中国城和韩国城相比，小东京要小巧许多，规模较小且不显眼。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与美国战争期间住在小东京的人们曾被强制搬迁，小城因此一度消失，这影响到现在小东京的规模。

照片 2



ロサンゼルスのコリアタウン  
洛杉矶韩国城  
로스앤젤레스 코리아타운

SGRA | 96 | REPORT

照片 3



ロサンゼルスのリトル・トーキョー  
洛杉矶小东京  
로스앤젤레스 북미오키나와현인회

照片 4



ロサンゼルス の北米沖縄県人会  
 洛杉矶北美冲绳县人会  
 로스앤젤레스 북미오키나와현인회

4

照片 5



北米沖縄県人会の新年会  
 北美冲绳县人会新年会  
 북미오키나와현인회 신년회

5

从上可以看出，在洛杉矶，从东亚移居过去的人们的社区分别以原本的国家为母体，形成了中国城、韩国城和小东京。这就是我所思考的移民中的民族要素。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个更加具体的事例。照片 4 是北美冲绳县人会这个机构的建筑。这是从日本冲绳移民到美国的人们的社区，离洛杉矶市中心较远。我曾参加过冲绳县人会的新年会，我想用照片向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

他们包下了整个餐厅，在午餐时举办各种活动（照片 5）。现场提供的食物都是美式的。穿着冲绳传统服装的来宾或是演奏冲绳音乐，或是唱歌，一直都在表演

照片6



节目。这是个增进大家亲善关系的聚会（照片6）。活动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大家就随着音乐，一起跳起了名叫 Kachashi 的冲绳传统舞蹈，气氛非常热烈。

当时跟我坐在一桌的有一位冲绳移民二代的男性，以及他的太太和姐姐。他太太的祖籍并不是冲绳，她告诉我她祖父母的老家在滋贺县。她说她也参加了滋贺县人会，但冲绳县人会的活动更有趣。2017年的时候，在冲绳我又一次见到了这对夫妇。冲绳每5年会有一次世界各地冲绳移民的聚会活动（“世界冲绳人大会”），他们当时就是去参加这个活动的。

在日本，冲绳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的地方。在被日本统治之前它曾是琉球王国。正如这些事例所示，与日本其他地方相比，冲绳人拥有更强的民族身份认同。

以上就是我希望大家从实例出发对现在具体存在的民族，亦或说族裔（ethnic group）进行思考的一个引子。

接下来我将进入正题报告。

## 1 人的移动与国境

### 1-1 “移动的自由”与国籍

我首先想思考的题目是“人的移动”与今天的主题之一的边界、“国境”之间的关系。

在思考国境时，我特别想关注的问题是“移动的自由”。现在，在移动的自由受到极大制约的状况下，我想首先思考究竟什么是移动的自由。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国籍”变得尤为重要。移动的自由，跨越国境的自由，与国籍密切相关。

幻灯片 1 中的资料是护照和签证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中的人是位朝鲜女性。但如果看一下左侧文字的话，就能发现写的是日语。最上面写着“日本帝国海外旅券”，所以这是日本护照，也就是说一位朝鲜女性持有日本护照。通过 1918 年这个日期大家就会明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被日本统治时期的物品。

如果再稍微仔细看看这位姓金的女士的护照内容，就会看到上面写有“因丈夫的探亲邀请，日本外务大臣许可其赴美国领地夏威夷”，也就是说她的丈夫在夏威夷，基于她丈夫的探亲邀请，她被许可前往夏威夷。

为什么会写有这样的内容？这是因为，当时严格限制了人们从日本去美国。在那之前，有一段时期从日本前往美国的移民骤增，导致美国引发了排日运动，就是不让日本人移民到美国的运动。日美关系因此恶化，为解决这个问题，日美之间达成了限制日本向美国移民的协议，这就是《日美绅士协约》。根据《日美绅士协约》，原则上只有家族成员的探亲邀请这种方式能允许日本人前往美国。就是说一般劳动者不能自由前往，但如果有家人在美国的话，探亲邀请这一方式是被许可的。这位朝鲜女性就是通过在美国的家人的探亲邀请成功前往夏威夷的。

她丈夫的护照也保存了下来，但却不是日本护照，而是韩国护照。他是在 1904 年，即韩国仍是独立国家的时期移民到夏威夷的。但那之后，因为韩国被并入日本，他妻子是使用日本护照通过探亲邀请的方式移民到夏威夷的。

具体点说，这个签证是横滨的美国总领事馆发行的。她先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本土的横滨，再从横滨前往夏威夷。通过这份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在近代人们跨越国境进行移动时，如果没有国籍是无法进行这种移动的。朝鲜女性为从被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前往夏威夷，就必须拥有日本国籍。

幻灯片 1

## 1 人的移动与国境 1-1 “移动的自由”与国籍



基于日美绅士协约（1907-1908）  
的亲属探亲邀请

（富兰克林·王堂、筱远和子《图说夏威夷日本人史》毕夏普博物馆，1985）

## 1-2 帝国主义与“移动的自由”

接下来，我想从别的角度思考人的移动，或者说移动的自由与国境关系的问题。

幻灯片 2 是两位出生于冲绳的男性回忆各自移民经验时的自述。

两人都于 1930 年代从冲绳移民塞班岛。塞班是当时被称作南洋群岛的密克罗尼西亚岛群的一部分。虽然不是日本的领土，但作为委任统治领地当时被日本统治。这份资料告诉我们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移民塞班岛。

首先是上方的渡口丽宗先生，他的哥哥们都同父亲去了巴西，但他自己却去了塞班。他说当时是因为征兵体检迫在眉睫，他急于脱身才这么做的。因为去巴西已经来不及办手续，才去了南洋。这里想请大家注意的是，巴西明确是外国。与此不同，南洋或者说塞班岛因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所以过去不需要其他特殊手续。因为不需要护照和签证，所以他选择了去南洋。反过来说，其实去哪里都可以，他只是去了更容易去的地方。

下方的照屋宽志先生也从冲绳去了塞班岛。刚才的渡口先生是 1932 年去的，而照屋先生却是 6 年后的 1938 年去的塞班。有人从冲绳前去参军，也有人去满洲或菲律宾。年轻男子都离开了冲绳，自己也就有了去南洋的想法，因为南洋相比满洲而言离冲绳更近些。照屋先生也一样，是去满洲，菲律宾（当时被美国占领），还是南洋，对他而言，不论去哪里，其实都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说，去国外，还是去被日本统治的地方，并没有太大差别。他只是移民到了对自己而言最容易去的地方。

从这两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当时，有必须去的理由才移民的人，其实并不多见。他们只是去了有工作的地方，或者说只是去了当时能去的地方。不过当时能去的地方确实绝大多数都是受日本统治的地方。以这种方式，当时日本的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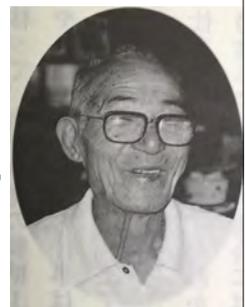
### 幻灯片 2

#### 1 人的移动与国境 1-2 帝国主义与“移动的自由”

渡口丽宗先生

（出生于1915年。1932年从冲绳移民塞班岛）：

哥哥们都（同父亲）去了巴西，而我之所以去了南洋，是因为征兵体检迫在眉睫，我急于脱身。因为去巴西已经来不及办手续，才去了南洋。去南洋的手续花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负责招人的金城善文全部帮忙代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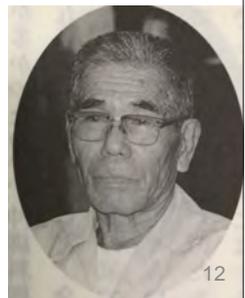


照屋宽志先生

（出生于1915年。1938年从冲绳移民塞班岛）：

那时，有人去当兵，也有人去满洲那边或者菲律宾。所以，冲绳没有年轻男子了，于是我也就有了去南洋的想法。南洋可比满洲要近多了。

（《具志川市史》第4卷，具志川市教育委员会，2002年）



12

与移动的自由密切相关。就是说，容易去的地方多是日本的领土。因为不需要护照和签证。

可以说也是因为他们拥有日本国籍，所以在日本支配下的地区内部的移动才变得容易。

### 1-3 战后国际政治与“移动的不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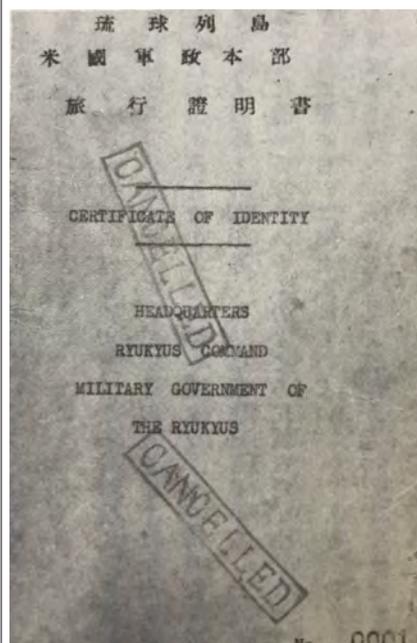
最后我想再讲一个跟移动与国境相关的事例。这是 1948 年的事。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而出现了“移动的不自由”的现象，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幻灯片 3 上是想从冲绳经由上海前去欧洲的一位名叫比嘉善雄的人的回想录。

1948 年在上海，比嘉先生为办理入境签证刚一交出护照，便被出入境管理官问“这是什么？”。回答说“是护照”，却被否定说“这不是护照”。照片是比嘉先生当时所持护照的复印件，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琉球列岛米国军政本部旅行证明书”。英语写的是“CERTIFICATE OF IDENTITY”，并没有写明是护照。这是战后冲绳在接受美国管理期间，即冲绳人的国籍变得非常模糊不清的时期发行的文件。是美国管辖，还是日本管辖，还是说两者都不是，没人说得清，于是冲绳人就拿不到护照了，只能使用这种模糊不清的身份证明书。

在美国这是有效的，但是去美国以外的地区就会出现上述被否定说“这不是护照”的情况。上海的出入境管理官暂且没收了比嘉先生的证明书，但第二天美国总领事馆就施压说“这是美军发行的文件，要是没收不返还的话可是会出事的”，于是这事才得以解决。

幻灯片 3



#### 1 人的移动与国境 1-3 战后国际政治与“移动的不自由”

（1948年，在上海）为办理入境签证我交出那个“护照”，出入境管理官的态度就变了。……他问我“这是什么”。

“是护照”

“哪有这样的护照”……

“这个我先没收了。明天早上你来警察本部领取”……

（美国总领事馆宪兵）大尉……一个劲儿地说“这个人的护照是由驻留冲绳的美军发行的。……要是没收不返还的话，恐怕有所不妥，那么您……”。对此就连（警察）署长也难以招架，只得勉强地打开桌子抽屉拿出了我的护照。

（比嘉善雄《我的战后秘话》琉球文教图书，1978年）

13

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了解到，20 世纪后半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冷战政治格局中，产生了像冲绳这样的归属不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移动变得非常不自由。而我们都知战后的国际政治，特别是冷战政治格局对这些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关于移动的自由与不自由的探讨。

## 2 越境的民族

### 2-1 横跨国家和地域的民族

接下来我想谈谈民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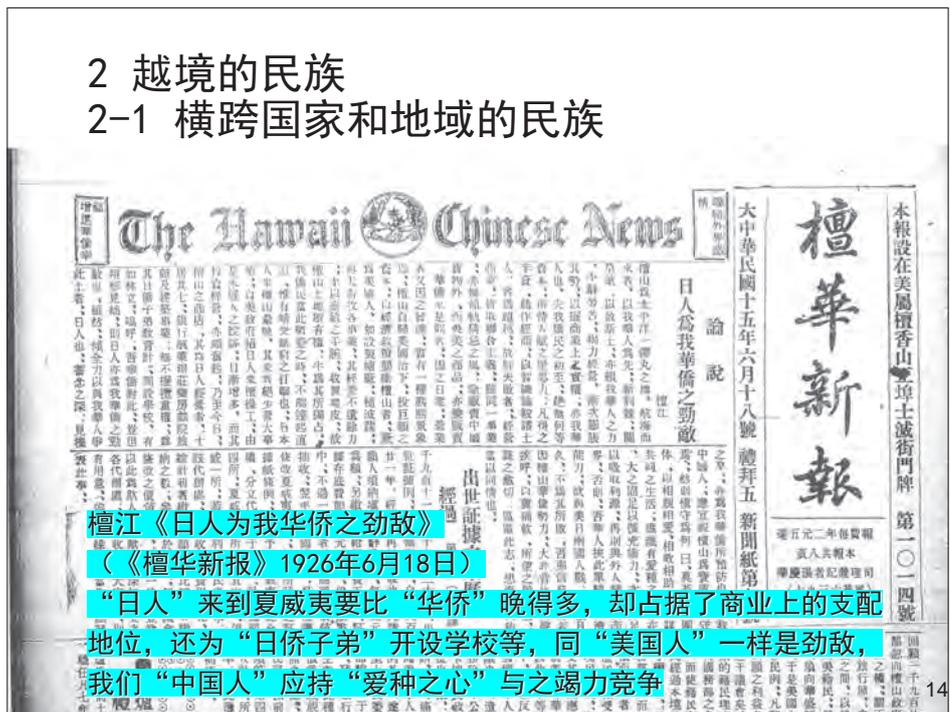
首先请大家看一篇 1926 年刊登在夏威夷的报纸上的文章（幻灯片 4）。

报纸上方写着“The Hawaii Chinese News”，是在夏威夷的中国移民发行的报纸，同时使用中英双语刊载文章。现在给大家看的这篇社论标题为《日人为我华侨之劲敌》，虽然标题给人一种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燃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印象，但文章内容完全不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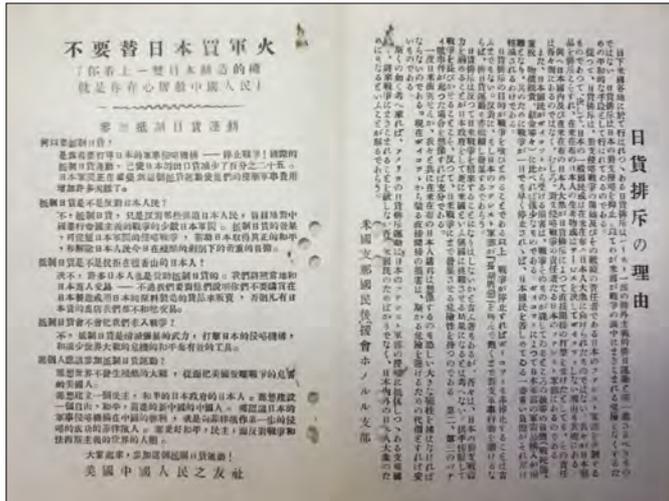
文章内容概括如下：“日本人来夏威夷要比华侨晚得多，却在夏威夷占据了商业上的支配地位。还为日侨子弟开设学校。从在夏威夷的势力来说，日本人同美国人一样都是劲敌，我们中国人应持‘爱种之心’与之竭力竞争”。这里使用的“爱种之心”一词很有意思，在这里指的就是民族。这里并不是说要与作为国家的日本进行竞争，而是作为民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或者说华侨与日侨之间的竞争。

但并不是说国家就与此无关了。之后日本和中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在夏威夷的日裔民族与华裔民族之间非常紧张的关系。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 2 越境的民族

### 2-2 母国的冲突与民族间的对立

“不要替日本买军火  
（你着上一双日本  
丝造的袜就是你存  
心屠杀中国人民）”

1938年，夏威夷的华裔居民在日中战争状况下进行呼吁  
但“不是抗拒在夏威夷的日本人”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夏威夷 日本人移民的150年与神往之岛的前世今生》2019）

日裔居民与华裔居民开展对各自母国的捐款活动

15

## 2-2 母国的冲突与民族间的对立

幻灯片 5 上是 1938 年在夏威夷的华裔居民呼吁抵制日货的相关资料。

“不要替日本买军火”说的是如果你（即住在夏威夷的华裔）穿日本丝造的袜子，就是给日本提供收入，就等于你在杀中国人。就是说他们在呼吁这些资金会被日本用来买武器。在祖国同日本作战时，夏威夷的华裔进行了抵制日货运动。但问题是，这样的抵制运动可能会对夏威夷的日裔造成损害。出售日本袜子的自然是日系商店。所以特地强调了这不是针对日本人的抵制，并用日语进行呼吁。

就这样，在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夏威夷的日裔与华裔之间民族的关系发生了两者并存且紧密联动的情况。

## 2-3 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族

在夏威夷的日裔与华裔之间存在社会经济关系，存在仅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无法说明的部分。

幻灯片 6 也是报纸文章。在这份名叫《马哇新闻》的日语报纸上，刊登了华裔经营的商店广告。这里的“WING SING WO 商店”和“AH FOOK 商店”就是华裔经营的商店。这说明了日裔居民是华裔经营的商店的顾客。

刚才提到了抵制日货，日裔居民表示只要有抵制，就会有报复，他们威胁说如此一来华裔居民将会蒙受巨大损失。当时在夏威夷，日裔人口远超华裔人口，华裔居民也认识到如果要进行抵制日货的话自己将成为蒙受损失的一方。因此，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抵制运动。

幻灯片 6

**2 越境的民族**  
**2-3 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族**

中国商店の广告（《马哇新闻》1931年10月9日）

日裔居民指出，如果自己对抵制进行报复的话，华裔居民将蒙受巨大损失（1938年）  
华裔居民也认识到“他们在数量上胜过我们，（抵制的话）我们会输吧”（1939年）  
另一方面，日裔居民对支配夏威夷的白人的排日运动表示担忧→即将成为现实

16

如上所述，民族之间会发生非常复杂的关系。我想说的是，仅靠国家之间的关系无法说明的情况也会发生。

### 问题提出

因为时间关系，后半部分进行得稍显仓促。最后我想提出问题（幻灯片 7）。  
总结一下刚才的内容，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的移动？”。通过日本的事例，我谈到，首先，拥有国境与国籍的主权国家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国际政治状况也是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话题是“人的移动带来了哪些影响？”。对此，我谈了会产生不同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民族之间的关系。

最后再追加一点的话，就是当今以人的移动为主题进行国史对话的目的这个问题。在对问题提出的事先解说中，我写的是“人的移动问题在国史中被忽视了”。我今天讲的内容，并不是通常日本史会教的内容，在日本出版的日本史教科书也鲜少提及。因此我认为国史经常会选择性地遗忘人的移动这一经常发生的人类经验。我特别想向中国和韩国的各位研究者请教，你们的国史（national history）对人的移动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我想把这一点也追加到问题提起中。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幻灯片 7

问题提出

1: 是什么在规制人的移动?

近代日本的经验:

主权国家 (国境·国籍) 与国际政治

2: 人的移动会带来什么?

近代日本的经验:

不同于国家间关系的民族间的关系

• 主要参考文献

盐出浩之《越境者的政治史：亚太地区日本人的移民与殖民》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

17



# 13-14 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的人的移动

赵阮

釜山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大家好,我是在釜山大学史学系教东洋史的赵阮。接下来我将用韩语进行讨论。我所研究的领域是 13-14 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的历史。虽然与盐出浩之老师研究的时代相去甚远,但有幸被赋予讨论的重任,因此请允许我对本人研究的“13-14 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的人的移动”进行简短的介绍。希望能对应今天的报告主题,就近代日本人移动现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研究做出贡献。那么我们就通过 PPT 进行讨论吧(图片从略)。

众所周知,因各种各样的交通和政治问题,东亚前近代时期的人们的移动受到了比较大的制约。但是我所研究的蒙古帝国时期却呈现出与此非常不同的局面。于 13-14 世纪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古是在草原上过着移动生活的游牧集团,他们把移动视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通过征服,蒙古打破了政治体制之间的界限,建立了欧亚单一霸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只使臣,商人、旅行者、宗教人士以及多种集团的人们,也均以个人和集体的方式在欧亚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的移动和移民。

在蒙古帝国时期,对于人的移动,从当时的政策上可以分为自发性和非自发性两种。首先,非自发性移动指的是蒙古将他们在对外征服战争过程中俘获的中亚和西亚的军人、俘虏、技术人员等人向蒙古帝国中心转移的移动。这些人被强制迁移到蒙古草原和中国地区,被用作蒙古帝国的重要人力资源。以军事为例,最具代表性的是在蒙古西部远征时期投降或被俘的出身于钦察草原的钦察人或中亚的康里人、阿速人等在中国驻扎并且定居后,被投入到南宋远征的事例。除此之外,中亚和西亚的工匠、手工业者和医疗人员等具备专业技术的人在移民到东亚地区后,分布在蒙古草原和中原等地,人们将他们称之为“色目人”。

另外,在征服战争过程中也有一些俘虏是从中亚和西亚地区一直跟着蒙古人进入到中国的。他们通过非自发性的移民离开原籍后,定居在当地。随着帝国进入稳定期后,还出现了一些奴隶化的俘虏从奴隶主手中逃走成为流浪者的有趣的人口流动现象。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自发性的移动和移民。虽然我在这里讲到的是经济因素导致的自发性移动,但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政治因素和为了获得升迁机会而聚集到帝国

中心的移动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帝国的建设背后，蒙古统治集团和穆斯林商业势力的结合。这些穆斯林商人在蒙古帝国时期享有移民、移动的特权，并在整个欧亚大陆自由经商。随着帝国的稳定，他们被提拔为蒙古帝国的官员，或者作为“斡脱”（即：御用商人）往返于陆上、水路、海上进行盈利活动。后来，这些人在中国地区定居下来，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朝时期，他们在户籍上被称为“回回”或在广义上被称为“色目人”。

在之前的讨论文中，盐出浩之老师提到了民族之间的竞争和各移民之间的竞争。这种现象在蒙古帝国也有出现。在中国同样出现过阿拉伯裔移民和中亚裔移民之间的竞争，为了争夺有限的地位和官职而引发的竞争，以及汉人与色目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等竞争现象。

另外，从蒙古帝国时代人的移动对政治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来看，以机动性为基础谋生的蒙古游牧民在建立世界帝国后，“流动性”在 13-14 世纪的欧亚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更是成为生活的一种形态。这种流动性在 14 世纪以后甚至带来了东亚民族形貌的变化，在各地形成了混合文化。忽必烈以后，成为大汗直辖领地的被称为“兀鲁思”的元朝，居住着从中亚、西亚移民过来的多样种族族群。除了蒙古人和汉人以外，还有超过 30 多种的色目人集团居住于此。其中的一部分人影响了今天在中国内地以宗教为基础的“回族”的形成。

除此之外，在蒙古草原活动的蒙古人在经历蒙古帝国时期后，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给民族的地域分布也带来了变化。另外，也出现了在文化与制度方面的融合。游牧文化与农耕、中原地区、中国传统制度发生了相互融合的现象。除此之外，由于种族的迁移，西亚的制度和文化与东亚的制度和文化的相结合，呈现出“知识融合”的现象。举个例子：阿拉伯的天文学知识在蒙古帝国时期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历法相融合，这对日后明朝和朝鲜的历法也产生了影响。在蒙古帝国时期，不同种族间的文化结合产生了混血和混合文化，可以说这是通过移民、移动而引发的变化的形态。

我的讨论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移动

张佳

复旦大学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张佳。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国史对话会议，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中国从元代以后的历史。所以我主要从我本人的研究的角度来回应盐出老师提出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历史上阻碍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因素，以及历史上出现大规模人群移动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这是我今天要大概跟各位老师来一起分享的议题。

在中国历史上导致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战争。我想这个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差不多的，应该是一样的。战争暴力打破了各个族群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界限，导致了人口的流动，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常见的。

我这里配了一张图，对这张图，不是专门做中国史的老师可能不是很熟悉，这是金界壕图（图1·p22）。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他们在中国的东北修建的防御蒙古骑兵的界壕，它们有壕沟，它们有城墙，主要来防御骑兵的。这就是一种族群之间的界限，族群之间的边界。这种边界在战争面前往往是比较脆弱的。中国历史上最明显的人口流动，它的表现，中国历史上一系列的北族王朝，所谓的北族王朝，就是由北方的游牧民族，生活在蒙古高原或者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朝代，像北朝，像辽，像金、元等等，这些北族王朝的建立，以及由于北方民族的南下导致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不断地南迁，由此引发了江南地区，即我所在的上海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即今天的广东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即今天的云南、贵州地区等的逐次的开发，逐渐地被开发出来并且逐渐地汉化。

我所在的上海地区，如果各位老师去读西汉的司马迁写的《史记》，就会知道，在《史记》的那个时代，上海地区还是很荒芜的。从东晋的时候开始，因为北方的混乱，有很多的中原人口迁到江南地区来，江南就逐渐地发展起来。这背后的动力是与战争导致的人口的大规模的流动有关系的。

这些流动，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是在中国内部的人口流动。但是如果放到历史上来看，这些人口流动都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族群跟族群之间的人口流动。当然，我们知道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流动也反映在东亚中日韩三个国家之间。比如，在明清易代的时候，明朝跟清朝交替的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移民到了朝鲜，移民到了日

图 1：金界壕



图 2：长城



本，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图呢，各位都很熟，就是中国很有名的长城（图 2）。长城就是一个农业人群跟游牧人群的人工边界，当然它背后是有它的依据的。长城的走向基本上是与 400 毫米等降水线的分布大概一致的。比如说，农耕社会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南下修建了这样一个战略的防御工事，当然这种工事往往在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发挥的作用不是那么大。刚才赵阮老师也提到过蒙古帝国时代，像蒙古在伐金的时候，长城似乎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二种比较常见的大规模的人群流动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性的移民，这主要是明清时的特色。这种政治性的移民或者政府主导的移民很早就有，西汉的时候，政府就经常会把一些各地的富民，一些有钱的阶层移到首都这边来，叫“实京师”，充实都城附近的地域，但规模比较小。但在明清的时候有几次比较大规模的移民，像明朝初年，那个时候因为北方的战争导致人口非常的稀少，所以政府就强制从山西南部地区移民到中原，移民到河北、山东。所以在现在的中国北部地

区，如果你问一位当地居民说，你老家在什么地方？有很多居民都会说，我的老家在山西，或者说得更具体，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有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大槐树移民传说，这在中国北方非常普遍。那背后所反映的背景，就是明朝初年政府所主导的强制性的移民。

另外还有一个流动方向，从明朝初年就开始的，是从江浙地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江苏、浙江地区向淮河流域移民。淮河流域在元朝末年战乱过程中，以及在淮河流域因为自然灾害比较多，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淮河流域人口比较少。这个移民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另外清朝初年也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移民，民间叫它为“湖广填四川”。四川地区在明朝人口比较多，但是因为农民战争，因为张献忠占据了四川，在当地造成了很多的破坏，到了清朝初年，四川人口非常少，政府从湖广地区招来大量移民充实四川。所以，今天四川地区人他们的饮食的口味跟湖南、江西的饮食的口味是差不多的。他们都喜欢吃辣的东西，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学者认为说背后跟这个移民的历史有关系。这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移民，也是导致人口大规模移动的一个因素。

中国历史上第三种大规模人群移动的原因是基于经济因素的人群自发的移动，这不是政府主导的。这种人群自发的移动，是政府所不喜欢的，是政府所禁止的。我这里放了一个图，是明代的“户帖”，是明代的户口本（图3·p24）。可能韩国跟日本的老师对于户口本这个词比较陌生，因为韩国跟日本可能没有中国这样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这套严格的户籍制度，规定你是出生在什么地方，你要居住在什么地方，这种严格的不能随意流动的户籍制度，一般认为是从明朝初年开始变激的。这份户帖里，你需要提供给政府一些信息。什么信息呢？包括你的籍贯是哪里，你在哪里生活，你家里有多少人，有多少田产。政府为什么要掌控这些信息呢？是为了保证赋税跟徭役的征发。也就是说，政府为了控制老百姓有这些富裕的资源，它对老百姓的流动是有一个极大的限制的，它是不喜欢老百姓流动的。按照明朝的法律规定，一个老百姓要离开家100里外的地方去办事，经商也好，还是做别的事情也好，按照规定，是要有政府开具的“路引”，要有一个专门开具的证明文件，证明你到100里以外的地方做什么事情。一旦脱离原籍就会变成所谓的“流民”。“流民”一直是中国政府非常警惕的对象。

虽然政府非常防范老百姓的自发移动，但是明清时期，因为人口跟耕地的压力日益严重，所以老百姓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产生自发性的移民是没有办法来完全阻止的。比如说，在明朝的时候，长城沿线的居民，长城本来是为了防御北方的蒙古人，但长城沿线就有好多居民，他们去出边，到蒙古草原的南缘那里去耕种，因为那个地方是可以开垦土地的。所以在明代在蒙古地区就有所谓的板升农业，就有很多长城沿线的汉族居民，农耕民族的居民到那边去种田。

另外更为明显的就是从清代后期开始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也有一个词叫做“闯关东”，到东北那边去闯荡。闯关东的主体是华北地区的汉族的居民。这些都属于人员的自发流动。

当然人员的自发流动起源也很早，不是明清时候才有的。我刚才想了想，最早提出说自己的理想如果不能实现，你可以到外面去的，最早提出这个理想的可能是孔子。《论语》里面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就说过，如果我的理想实现不了，

那我就坐着船到国外去吧。这可能最早的鼻祖是孔子吧，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了。

这就是我所要分享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阻碍人口移动的因素以及人口大规模移动背后的推动原因，谢谢各位老师。

图 3：明代户帖





# 古代及中世日本的出入境管理

榎本 涉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我仔细听了盐出老师的报告，讲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主要研究中世日本的国际关系，所以这次想谈一谈出入境管理问题，以此回应盐出老师提出的问题。

在日本中世时期，前往国外的人的移动并不少见，但因为当时社会结构是分权关系，从幕府朝廷等中央政权到庄园领主、国主、大名等，都缺乏对移动的管制力，所以当时的出入境管理不同于近代主权国家。

与此同时，虽然与近代原理不尽相同，古代日本也发挥了一定的由国家进行的出入境管理的职能，一定层面上便于我们将古今进行对比。

在进入中世的讨论之前，我想先谈一谈古代，以便对此问题提示一个历史概观。

在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度下，原则上由天皇掌管国境的出入。从日本出国者当中，有遣唐使等国家使节，他们通过天皇的任命而获得出国许可，以天皇使者的身份获许进入前往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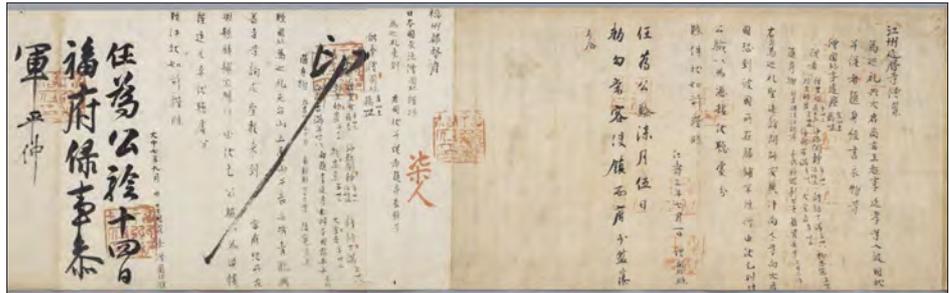
但在 838 年的承和年间最后一次遣唐使之后，直到 14 世纪国家使节从日本前往海外的大门被长久地关闭了。取而代之前往国外的是，乘坐商船以个人名义留学的僧侣们。他们在出国的时候也需要得到天皇的特别许可。制度上这对出国者是一种限制，但同时对于僧侣本人来说，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国家保护。

幻灯片 1 是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资料，是 853 年天台宗一个名叫圆珍的人乘坐唐朝商船前去留学时开具的文书。

右侧是日本大宰府（在九州开设的政府机构）的文书，左侧是唐朝福州都督府的文书，在这两份文书的中间盖有福州都督府的印章。

这份文书显示了需要办理的手续，我将其总结在下方方框里。手续如下：1. 圆珍法师向大宰府提交入唐申请书。2. 大宰府在 1 上盖印，再由大宰少监在后面追加签署“任为公验……”，并将许可证交还圆珍法师。3. 圆珍法师在福州登陆后，将申请唐境内通行许可的申请书贴在 2 上并提交给福州。4. 福州府在 2 和 3 上盖骑缝印，在 3 上多个地方盖章并附上印鉴的证明，再由福州录事，就像刚才的大宰少监一样，在后面追加签署“任为公验……”，然后作为许可证交还圆珍法师。就是说，圆珍在大宰府获取的公验是他正式从日本出国的证明，这个证明要提交给

## 幻灯片 1



唐·福州都督府公验（853年9月）（福州都督府印） 日本·太宰府公验（853年7月1日）

1. 圆真法师向太宰府提交入唐申请书
  2. 太宰府在1上盖印，再由太宰少监追加签署“任为公验…”并将许可证交给圆真法师
  3. 圆真法师在福州登陆后，将申请唐境内通行许可的申请书贴在2后并向福州提交
  4. 福州府在2和3上盖骑缝印，在3上盖章并附上印鉴的证明，再由福州录事签署“任为公验…”
- 这里的太宰府公验就相当于护照 唐式的人名和地名表述

赴唐的登陆地的当地政府，用以申请入境后的移动许可。

大宰府似乎也是以公验要提交给唐为前提而发行的。文体与福州都督府公验相似。而且人名和地名等也不是日本通常的写法，而是以中文风格写的。可以推测出，他们发行证明书的前提是需要向中国出示。对于圆珍来说，这是一种身份证明书，可将其视为相当于护照一样的文件。

如上所述古代国家之所以能对人的出入境进行管理，是因为当时的大宰府负责管理来往的商船，所以能对乘坐商船出国的人进行一定的检查。

但 12 世纪末进入镰仓时代后，就不再进行这种检查了。这个时期的船只和人都可以随意出入国境。中日间往来的僧侣规模也因此变得非常庞大，从 12 世纪末开始的两个世纪里，光知道姓名的就有 600 人左右。虽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但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前现代中日之间留学的一个高峰。

不过，没有了国家层面的管理并不见得都是好事。因为这也意味着不再会有公开发行的护照。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名叫“度牒”的特殊的文书，这是国家许可僧侣剃度出家的证明公文。“度牒”本身是从律令时代开始发行，现存的前近代的“度牒”有几十份，其中有 4 份很特别。它们发行于镰仓时代，与普通“度牒”不同，是特殊的存在。

这是《早稻田大学收藏文书》中一个名叫友山士德（Yūsan Shide）的禅僧出家时所发行的文书（图片从略）。它不仅格式与通常的“度牒”完全不同，在格式以外也有很多不同点。首先它的尺寸是通常度牒的两倍，并使用了黄麻纸，这是一种在日本通常不会使用的上等材质的纸张。纸面上印有“太政官印”的印章，但这个印章实际上只在朝廷发行的文书上才会被使用。通过图印可以判明它明显是伪造印，是假的。而且文书中所写的官职名和地名具有中国风格，并不是日本常用的表述方式。署名处虽然有人名和花印，但其实是并不存在的架空人名，花印自然也是假的。

那这份奇怪的文书究竟是什么？其实关于这份文书，江户时代的伊藤东涯已经指出“这是为了赴宋而伪造的”（《制度通》），一语道破了它是为了去中国而伪造的东西。

包括这个友山的“度牒”在内，现存的 4 份伪造“度牒”均为赴宋、元僧侣之物。

所以，如果考虑到这是为了在中国使用而制作的东西，那就很好理解了。此外，在中国元朝时期的资料中，存在当时日本的僧侣入境时确实使用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度牒”的相关记录。如此说来，这种伪造的“度牒”可以被认为是伪造者在充分意识到要将其向中国人出示的基础上而精心制作的，伪造者在格式与地名表述上下功夫，使其书写方式更易于被中国人接受。

关于伪造这种文书的原因，其中一个理由便是这个时期前往中国的僧侣无法得到国家对其个人身份保证的缘故。在这种状况下，他们以身份证明书“度牒”作为代用证明。因此，既然是以在中国获得中国人的信任为目的，那与简陋的真度牒相比，自然是更倾向于使用华丽的伪造品。但是，大家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要伪造“度牒”呢？既然要伪造，那伪造刚才给大家看过的大宰府发行的护照不是更好吗？这些问题我今天在此就先按下不多谈了。

以上，我分别谈了国家对出入境进行管理与不管理时期各自的状况。前一个时期国家发行护照，而后一个时期则停止发行了。因此，前去中国的僧侣需要自行准备代用文书，从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中世日本社会时期无所不包一切皆可的混乱无序。但他们的要去的中国与此不同，至少在形式上官僚机构是运作的，所以哪怕是弄虚作假也要准备相当于护照的公文，要不然在入境时或入境后的行动方面可能会产生诸多不便。

我认为出航的人们的这种为配合对方社会做出的努力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时间差不多到了，以上就是我提出的话题和浅知拙见。谢谢大家。

## 指定讨论 4



# 近代韩国人的移动

## 韩 成敏

世宗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大家好，我是世宗大学的韩成敏。我认真听完了盐出老师的报告。我相信翻译老师们的业务能力，会偶尔在报告中添加一些原稿中没有的内容。继上次菲律宾之后，这次也拜托翻译的老师们。

我没有另准备 PPT，但我将附上几张相关照片进行报告。关于第六届国史对话主题和盐出浩之老师的报告，我将分成三个部分进行评论。

第一是近代韩国人的移动问题。在我看来，近代韩国人的移动同样可以大致分为三项。首先，不管是为了生计，还是为了韩国的独立运动，有一半的人是自愿选择移民的，这些是民间的自发行为。第二是国家通过政策推进的移民。第三是随着韩国成为殖民地，日本推行的强制动员。

可以说，韩国社会大规模移民海外的先河，始于 19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韩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混乱，以及持续数年的大饥荒令朝鲜人饱受痛苦。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人移民到现在的中国东北三省。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对岸，当时这个地区在韩国被称为“间岛”。当时，韩国将该地区分成了两大部分来看待。大家看一下这张地图（图片从略），能看到鸭绿江对岸，这一地区是现在辽宁省的一部分，当时这里被称为“西间岛”。图们江的对岸，也就是现在吉林省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当时被称为“北间岛”。

此后，随着日本加强了对韩国的统治，开展独立运动的人们以及被没收土地的农民等众多韩国人向满洲、俄罗斯沿海州等地移民。结果，当时该地区出现了多个“以大规模的韩人社会为基础”的独立运动团体。现在仍有大量的朝鲜族居住在这里，形成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一时期，前往俄罗斯沿海州的人们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被强制移民到中亚地区。因此，韩人社会也存在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大约一个月前，洪范图将军的遗骸从哈萨克斯坦被移交回韩国。我认为，这成为韩国社会重新认识存在于中亚的韩人社会的契机。

第二是由国家主导进行的海外移民。于 1902 年至 1905 年间进行的夏威夷移民，韩国政府响应了夏威夷甘蔗农场主们派遣工人的提议，将其作为国家政策予以推进。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夏威夷甘蔗农场主们提议韩国人移民。就像刚才盐

出老师报告中所提及的那样，当时夏威夷随着中国劳工移民人数的增加，作为替代方案推进了日本移民。在日本移民增加之后，又提出将韩国移民作为替代方案。以此为契机，当时的韩国政府专门设立了专职机关，负责发放近代护照等业务，这也成为近代旅游、移民行政开始的契机。此照片即当时大韩帝国所发放的护照（图片从略）。

刚才在盐出浩之老师的报告中，看到了发给殖民地朝鲜人的护照。当时，他们在农场的实际生活状况与招聘广告中所描绘的截然不同，可以说是非常糟糕。韩国人的美洲大陆移民以夏威夷为起点，扩展到美国本土、墨西哥、古巴等地。这是当时刊登在《皇城新闻》上的招聘广告（图片从略）。由一位叫德什勒的人经营的“东西开发公司”代理了移民的招募。这是他们发布的广告：家人可以陪同前往，冷暖适宜，求职容易，月薪为 15 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 30 日元 / 约 57 韩元），这在当时可谓是非常丰厚的工资收入。广告虽好，但实际情况与广告里所描述的却截然不同，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下面的照片中所展示的是当时在夏威夷甘蔗农场进行作业时的情形（图片从略）。

海外移民的第三项，即最后阶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日本帝国政府于 1940 年代对殖民地朝鲜人进行的强制动员。殖民地朝鲜人以征用、征兵、日军慰安妇等多种形式被强制动员到海外，成为了牺牲品，幸存下来的人中也有一部分选择在当地定居。因此，目前居住在海外的韩国人人数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这个问题目前在韩日之间持续引发严重的矛盾。该文件是当时的朝鲜总督府写给被征用的朝鲜人的信件（图片从略）。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两方面：第一是叮嘱他们是与战场军人一样的后方战士，所以不要逃跑，要为家乡的家人做“产业战士”认真工作的内容；第二是怂恿那些于 1939 年被动员的合同已经 2 年期满的劳动者续约的内容。

关于这个主题，我想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我认为有必要从跨国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正如盐出浩之老师报告的那样，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了解人的移动的话，那些实际参与移动的人们的多种多样的移动动机和复杂状况会消失不见，留下的只是作为代表和象征的国家与作为集团的民族而已。也就是说“移民的性格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但他们却可能会被视为单一集团”。这样一来，“只会凸显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对立，而少数群体、弱者的牺牲不仅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因此，我希望可以从跨国的观点来理解近代以来的人的移动这个主题。

除去国家和民族这一标准，当时移民海外的大部分人不管是想要抓住新机遇的主动动机，还是被权力力量强行移民的被动动机，他们的共同点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生活的家园中被挤出去的社会弱者。而为了抓住新的机会而去留学一段时间的人，则属于不同的性质。即使不确定他们的归期，但有着回来打算的人和彻底离开的人是不一样的。

以这种移动的观点来看，由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注，使得国内移民不被看见。国内移民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城市士绅化 (gentrification)”便是其中之一，弱者在构筑起自己的生活家园之后陷入被排挤出去的境地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人的移动有时会触发连锁移动，日本剩余农业人口向韩国移民，触发了韩国人向满洲移民。所以我希望有机会用不一样的观点来探讨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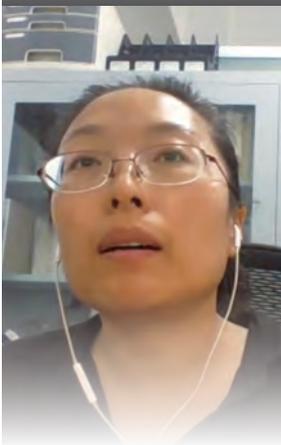
最后是“流散 (diaspora)”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除少数几种情况，移民在当

地社会中通常是少数，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也是不同的。这不仅成为移民在社会中被歧视的原因，还会使其承受强迫同化的社会压力。作为对此的回应，对拥有共同语言和文化，并且身处相同处境的移民来说，同族、同国人聚在一起生活是出于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为实现顺利落脚的目的而发生的非常现实和理所当然的现象。因此，无论在移民社会中的地位是殖民者集团，还是为了生计而无计划移民的弱势群体集团，他们通常会选择群聚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即使时间流逝，却依然选择保留祖国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规范来进行生活，虽然移民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这可以说是“流散”的基本背景。

但这也会成为强化社会歧视的因素。在民族间的问题、多数和少数的问题上，我们该如何把握“流散”问题是我的关注所在。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移民和移动变得更加自由，范围也更加广泛。但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国家”这一国境要素成为最后一关。在前近代时期，为了不让人们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区域社会，“对人民的控制”是最基本的举措。但是现在国内移动已不太成为问题，而成为最后一关的国境虽然仍是一个问题，但坦白地说，国境如今也正在逐渐瓦解，那么剩下的就是具有不同文化的集团之间的问题了。

刚刚盐出浩之老师报告的内容中谈到了在夏威夷发生的日裔居民与华裔居民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非常特殊的事例。在一个基本上属于少数派的社会里，各移民集团之间的竞争并不会凸显太多。夏威夷属于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东亚系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地原住民和美国白人，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大多数”的主导权之争。

另外，在报告开头介绍了冲绳县人会和小东京。我想知道这两个组织是否不同，还有就是独立运营的冲绳县人会与洛杉矶日本人会有无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两年前参加日本市民团体“和平船”的活动中有过体验。“和平船”与韩国的“环境财团”几乎每年都会联合举办“和平与绿色船”活动。我曾作为嘉宾去过那里。在自由报告的时候，冲绳的青年们进行了发言。青年们所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冲绳美军的犯罪问题，当时让我感到非常困惑与惊讶的是参与活动的日本人的大部分提问内容都是询问他们的国籍是否纯粹。不断提问确认他们“是不是日本人”，甚至还有“是否想从日本独立出去”的提问，这让我感到非常忧虑困惑。因此，我非常好奇洛杉矶日本人会和冲绳县人会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呢，还是毫无关联各自进行活动的状态。我的评论到此结束。



# 从中心到边缘 ——关于“佐米亚 (Zomia)” 概念

秦方

首都师范大学

非常感谢盐出老师的引言。受邀参加这次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是因为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从事关于移民和国家的实证研究，所以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具体的研究成果，那么只能就本人最近在读的 James C. Scott 的这本书《逃避统治的艺术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还有这两年我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所做的一些田野调查，简单谈一些我的感想，希望抛砖引玉，能够激发大家的讨论。

Scott 在这本书里面他所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 Zomia，可能很多做东南亚国家政治的学者都非常熟悉。Zomia 是指这些主动逃离国家统治的山区民众所占领的地区。这个概念背后所反映的是人口流动和国家治理的关系。Zomia 尤其发生在现代国家生成之前的时期，特定的人口由于战争、饥荒、瘟疫，或者只是不想再接受国家的统治，而从中心离开来到这样一个边缘的地区，甚至是从边缘的地区也离开。作者的研究提醒我们，这些早期形成的国家，它的管制力所能直接达到的地方，比我们想象中要小一些；国家对人口流动进行管理的态度，也比我们想象中要灵活很多。中心和边缘或者是边缘与边缘之外，一般会在一种平衡 - 打破平衡 - 再恢复平衡的周期中找到一种相处之道。于是，很多人可以在这样的缝隙中穿梭往来，远离国家的治理，在山区中以一种无政府 (stateless) 的状态来生活着。Scott 这本书最终想要挑战的一种观点，是那种中心一直吸引边缘群体前来的文明叙事，就是说以农业（当然后来变成了工业）、文字和阶级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被我们命名为文明，而那些身处边缘、被冠以野蛮、落后的群体，则开始了一个不断向往文明、追寻文明的过程。在这其中，不管是前近代以农业为主的帝国国家，还是以工业为主的现代国家，都在这样一个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扮演了核心和中心的角色，成为那个吸引、推动人口流动的分析类别 (the analytical category) 和研究对象。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非常习惯于以国家为单位，用边境、海关、国籍和护照这样一些现代国家管理方式来掌控人口出入境的流动。之前盐出老师的文章《国籍如何左右人的国际性移动？》也深刻地指出在现在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时期，这种以国籍来管理人口流动的方式，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议题。对此，我深表赞同。

现代国家往往自豪于越来越精密的人口移动管理方式，但是在同时，这种自豪也伴随着一种越来越深刻的失控焦虑。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在于，当国家在进行人口管理时，如何界定“人”、“人口”这样的关键词？是以国籍来界定，还是以居留的实际情况来看来界定，还是以种族、民族，或者是宗教来界定？同样的，什么叫做“流动”？为什么向一些方向的流动被赋予了更多的信任和自由，而向另外一些方向的流动则被视为非常可疑、由此需要更加严密的管制？甚至采取不同的交通工具来进行流动，其实都会引发人们脑海中对特定人口流动的刻板印象。可以说，现代国家对人口移动的管理机制，虽然看似严密，而且目前看来会越来越严密，但是这其中仍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看到很多宏大的正在发生的国际的例子，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只想稍微讲一下我自己本人的一些田野观察。

我自己目前正在做的田野，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去关注人口流动这个议题，尤其是跨国界的人口流动。但是当地的受访人不停地在他们的叙事之中提出这个问题，反过来使我意识到这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一个他们想要我这样的外来者知道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跨界人口流动至少在疫情爆发之前，是一个非常日常的行为。但是，他们却判断，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而言，这是一个值得说一说的议题。这是为什么，我仍然在思考，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所以目前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答案。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日常行为，是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和另外一国边境人民的往来十分的密集。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一些关键性的作用，决定了双方往来的方向。哪边经济发展好，大家就往哪边去，去找工作，去结婚，去走亲访友，去过节。有时候翻过一座山、跨过一条河，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而这种流动成本，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需要很便捷地办一些手续（如出入证）就可以。当然，我后来也知道，有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国家为了防止青壮年的劳动人口和女性的流失，把办理出入证变成一个非常繁琐和昂贵的事情，通过提高时间和行政成本，以此来阻止特定群体的流动。

但是，这样一个日常性的存在并不是说他们否定了国家的存在，恰恰相反，双方的人都会意识到国家之发展对于他们这些边缘地区的影响。他们会把国家的发展比喻成像扔进水里的一块石头荡起的波纹那样，从中心到边缘，最后会来到他们这边。由此，他们反而愿意用国家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生活改变和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情况，尤其喜欢津津乐道说之前都是我们到对面去，现在则是对面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我现在做田野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得知这样的人口流动对当地的人口、家庭和职业构成会有怎样的负面影响，这还是需要持续观察。但是，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是，这些人主动承认并且接受中心和边缘的权力关系，他们非但没有去挑战这样的权力关系，反而又借助国家这样一个大中心来为自己作势，在当地构建起新的中心和边缘关系，并且使自己成为这个新的中心的受益者。

因此，我们要如何来理解这种移民、国家和权力关系呢？国家作为一个实体确实存在，国家作为当地人对权力的认知和想象也是存在的，然而由于其远离中心的边缘性，当地人反而获得了一些可以腾挪迂回的空间。由此，回到最初提出的 Scott 的观点，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那种站在中心去思考中心和边缘的不言自明。从边缘来看，或许在当下很多人可能无法成为像 Zomia 那样的逃离者，但是却可以成为远离中心的受益者。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希望听到各位老师和朋友的点评，谢谢。



# 帝国、人权、南洋 ——政治思想视角下的思考

大久保健晴

庆应义塾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今天有幸得到在指定讨论上发言的宝贵机会，真的非常感谢。

第6届国史对话关注“人的移动”与“国境”、“民族”，旨在重新审视过去以一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重新探讨主权国家的概念，我认为这次会议意义深远。近年来，着眼于人员及物资流动的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推进了对以往以西方帝国为中心的世界史、文明史，以及与之对抗发展的关注各国民国家历史多样性的国史研究的反思。

今天盐出老师提出的问题与这一研究动向密切相关。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我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技术转移与帝国历史”问题。19世纪后半叶以来，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各国为实现本国的现代化，纷纷从以西方为首的文明国家引进学者、技术人员，称他们为“雇佣外国人”。在此，我想从“人的移动”这一主题，对这些“雇佣外国人”和所谓的“移民”简单做个比较。

先举个例子，19世纪后半叶，在明治国家形成之后，日本从荷兰招聘了乔治·阿诺德·埃舍尔（George Arnold Escher）、约翰尼斯·德·里耶克（Johannis de Rijke）等许多土木工程师。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技师都是在荷兰学习、掌握了专业技术，却在本国找不到足以谋生的工作。为了求职谋生，他们只好去到爪哇、上海、日本等与本国荷兰关系深厚的殖民地、居留地等地，成为“帝国工程师”。

此次盐出老师的发言主要关注了从日本移居到南洋群岛和满洲的日裔移民。表面上看这些“雇佣外国人”属于政府一方，即统治者一方，而移民则属于被统治者一方，乍看之下，二者似乎不同。但他们都是根据本国殖民政策被派遣到海外，给当地传授技术、提供劳动力的人员，从这一点看，二者是有共同点的。

从这一比较中，我们还能看到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全球史研究关注“人的移动”，但在关注技术转移和劳动市场时，就会发现到头来不还是与以帝国为中心的霸权、掠夺史的研究越走越近吗？如前所述，探讨国民国家的多元化存在方式的国别史研究是通过批判西方帝国主义中心的世界史研究才发展起来的。今天，学界对移民等“人的移动”的研究也正是为了打破国民国家框架而做出的新的尝试。但是，这样

的研究最终是否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被纳入到以帝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中去呢？只要它不是简单的帝国史研究，我也相信它不会是简单的帝国史研究，那么我也想就此请教盐出老师，您认为它能给历史研究带来何种新的可能性？

与这个问题相关，我想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主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问题。我想在此讨论的是“难民”问题，在人的移动与主权国家的探讨中，这个群体经常被忽略和遗忘。在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1951年后发表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在谈到成为难民的犹太人遭受迫害时进行了如下阐述。我试着总结一下她的主张。

阿伦特认为，我们主张普遍人权的存在，它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不能被任何人剥夺的权利。我们认为人权是独立于政府和主权国家、每个人都平等享有的权利。如果因为政府的独裁统治或者内战等而失去国家庇护、公民权被剥夺而成为难民或无国籍者时，人们所能仰赖的就仅剩出生时被赋予的人权。但真到那个时候，人们的这个所谓普遍人权由谁来保障呢？在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中，有哪个是做好了保护这些人的人权的准备了的呢？

当然，1948年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于1967年订立了《难民地位议定书》。但即便到了现在21世纪，无国籍者与难民的人权问题依然是尚未解决的全球性课题。这与今天盐出老师提示的讨论密切相关。我们认为“人权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普遍价值”。但脱离主权国家的人权真的存在吗？脱离了主权国家，人权也就无法保障了吧。如此一来，那些受主权国家迫害的群体的人权又会如何呢？我认为历史研究在分析人的移动时绝不能忘记这个具有批判性的政治哲学课题。关于这一点我想听听盐出老师以及各位老师们的想法。

最后，第三点是如何看待南洋地区原住民的问题。盐出老师在报告中，将旅居夏威夷的华裔和日裔作为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民族”，重点探讨了在与当地白人对抗的背景下，华裔和日裔之间的微妙关系。那么另一方面，这些华裔和日裔移民又是如何看待夏威夷原住民的呢？1860年，福泽谕吉乘坐威临丸（船名）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旧金山途中访问了夏威夷，他曾使用“蛮民”、“土人的风俗很污秽”等字眼来描述当地原住民。

这个问题与近代日本的“南洋”意识密切相关。19世纪后半叶，随着明治国家的建立，日本对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及东南亚的关注日渐高涨，竹越与三郎、志贺重昂、田口卯吉等多位学者都写过有关南洋的论述。一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将南洋群岛以委任统治的方式移交给日本统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矢内原忠雄等多位学者研究在南洋的殖民地统治问题，他们提出的南洋论、南进论等阐述，内容多种多样，但都无一例外地将南洋群岛的原住民看作是如动物般落后的存在。然后20世纪的大日本帝国又开始鼓吹“北进论”，主张进军朝鲜、满洲等北方地区。同时，还主张南进论，试图向东南亚扩张领土。结果导致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本的确跨越国界与中国、朝鲜等国的人民有过民族对立。但另一方面，正如“同文同种”一词所意指的，同时也存在东北亚国家同属一个文化圈的概念。今天盐出老师在报告中，也用了“爱种之心”这个词。对此，“南洋”却被排除在这一文化圈之外。我以为，这个观念不仅是近代的产物，它早已深深扎根在近代以前的亚洲历史的土壤里。

2020年1月，“第4届国史对话”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我们在会上一致认为“亚

洲”这个概念不能限定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应该从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更广的范围加以把握。

从中国、韩国、日本各自的立场来看，“南洋”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从“跨境民族”这一视角出发，又该如何思考“南洋”与亚洲认识的历史问题？我希望可以与盐出老师以及各位老师讨论这个问题。

以上就是我的指定讨论发言，谢谢各位。

## 回应指定讨论者

##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首先，韩国的赵老师和中国的张老师的报告都以蒙古帝国的话题为中心，我从中了解到了许多深刻的内容。特别是重视在蒙古帝国内部的移动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我在自己的问题提起中比较重视“自由”与“不自由”这两个词，而二位老师的报告则以“自发”与“强制”为中心展开，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就是说，即便在没有自由，或国家不太承认自由的移动的情况下，也要进行自发的移动。二位老师指出了人们不顾国家管理而进行移动这一情况，在这一点上自发与强制对于移动来说变得非常重要，二位老师提出的这一认识，我认为可以成为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关于日本，榎本老师谈了前近代的移动状况，不过侧重在中世日本疏于管理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关联刚才蒙古的话题，围绕着在自发与强制的层面能进行何种定位这个问题，尤其是从比较的视角思考，将内容拓展深化。

刚才韩老师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因为时间紧迫，接下来我将主要对此进行回应。韩老师提到，从国家和民族的视角来看移动的话，很容易忽视掉个人在移动方面极其多元的动机，我对此有同感，有非常相似的观点。特别是以国家框架来看人的移动，我认为是非常有局限的。但是我为什么特别重视民族这一词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在此处使用的不是 nation 意义层面的民族，而是 ethnic group 意义层面的民族，是因为正如韩老师所指出的那样，ethnic group 是跨越国家的存在。这正是我特别想谈的。再进一步补充的话，个人确实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动机与缘由而进行移动的，但不可否认，国家权力的存在左右了人的移动。再说回刚才提到的民族和 ethnic group，民族对于因各种缘由而移动的人们来说，犹如定心骨一样的存在。比如说在经济上有时候可以得到其援助，还有就像刚才提到的北美冲绳县人那样也可以提供再次确认自己身份认同的机会。这一点正是我特别想要思考的。

关于北美冲绳县人以及现在的冲绳独立论、美军问题等之间的关系，也有复杂的面向。战前从冲绳移民美国的人与战后从冲绳移民美国的人之间在观点上似乎存在差异。战后移民的人对美军持有非常强烈的批判态度。因为时间关系，相关具体讨论请允许我在此略过。

然后，秦老师的报告非常有意思，同刚才韩老师的报告的要点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报告指出中国西南地区的人们往返于本地与东南亚诸国之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反而能够利用国家来促成自己的移动，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有意义。就是说，跨越国境的移动正是通过利用国家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我也认为这个层面确实存在。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移居他处，为实现该移动而获取护照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看做是一种对国家的利用。当然，通过这种形式国家方面也对人的移动进行管理，人们被这一管理形式所左右，但其中也存在反过来对其进行利用的情况，我也认为这种相互作用的观点非常重要。

最后大久保老师所指出的要点也与此密切相关，大久保老师指出，人的移动的



历史最终可能无法避免地只是成为帝国的历史，那岂不是毫无意义。大久保老师指出的这一点确实可能存在，但我并不认为其必然会被帝国的历史回收。我刚才也谈到了，我的观点是国家一方与社会一方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人们移居他处这一行为中存在社会经济动机。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对其进行管理，而人们则试图对此进行利用。我认为应该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中进行观察分析，而在我看来，一直以来的帝国史恰恰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于对夏威夷原住民的歧视问题的分析，我完全赞同，这与刚才韩老师的观点也相关。刚才有老师提到说移民最终成为多数派的情况是个例外，但我并不认为必然如此。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人类史中，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移动到他们的居住地的，而所谓成为多数派，也只不过是从后来移居过去的人的视角看到的结果而已。而美国的白人明显是后来移居过去的，但他们却成为了多数派。这么看来，夏威夷的亚裔移民确实是后移居过去的，却也成了多数派，这虽然说确实是不多见的情况，但并非不可思议。移居夏威夷的这些人曾歧视原住民是不争的事实，以这种不同于国家支配形式的在人们之间产生民族间等级关系的问题，我想也包含在我这次报告的课题里。

第2场

## 自由讨论1

主持人：南基正（首尔大学）

成员：讲师与指定讨论者

[以母语发言]



南基正

好的，谢谢。以上是指定讨论者和提出问题者等七人的发言。在第一场进行指定讨论的老师也请全部打开视频参加，谢谢。那么在第一场发言的三位指定讨论者和在第二场发言的三位指定讨论者，还有盐出浩之老师，请七位精炼一下话题。在第三、第四场进行自由讨论的老师虽然没有机会，但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观点，请通过聊天栏进行表述。

我是津津有味地聆听了各位的报告，我觉得纵横交错的内容非常有意思。从时间跨度来看的话，是从中世一直贯穿至现在。地域上则涉及的不仅仅是中日韩所在的东北亚，还有东南亚，甚至还会横跨太平洋。将蒙古帝国作为背景，以欧亚作为舞台进行移动的内容，还带出了其他更多内容，其中还有人提出了涉及政治思想的移动问题。在进入自由讨论之前，我想先谈一下设定这个主题的契机。

刚才也谈到过，我们在马尼拉举办的第四届大会上以“东亚”为主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在准备第五届大会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新冠肺炎大流行。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状况下，我们以“传染病的流行”为主题进行了一次网络会议。当切身体会到移动的受限之后，就有了以“在东亚移动的问题”为主题作讨论的想法。人类的移动本来应该是自由的，但现在却变得不自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了“人类的移动是什么”这一提问。另外，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爆发之前，东亚就已经有了限制移动自由的区域。希望大家能记住，我们的大会就是以此为前提诞生的，希望各

位能继续提出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比起阐述自己的主张，更鼓励以对话的形式进行。时间为 30 分钟左右，请考虑好一两次左右的发言，如果可能的话，请将发言时长控制在 2 分钟以内，发言时请使用母语。而且七位老师的所属已经公开，所以请首先明确提问对象的身份。固有名词或专业用语请在聊天栏或用纸张在画面上展现出来。还有，由于翻译人员需要准备，所以请留出一点时间，等我进行指定后，请再开始发言。那么谁先发言？还是让我来指定吧。

首先，对于最后进行指定讨论的大久保健晴老师的提问，盐出浩之老师似乎已有回应。希望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点的大久保健晴老师能对此继续进行意见阐述，然后再请大久保老师向其他老师提问。

大久保

谢谢。盐出老师的回应非常有说服力。正如会议主持南老师刚才指出的那样，虽说我们今天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见到了彼此，但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于人的移动受到了限制，我们正在不断失去原本通过面对面讨论才会产生的化学反应。盐出老师的研究关注的是跨越国境的人的移动会带来什么。他认为这个研究带有超越一直以来的帝国史研究的可能性，对此我深受启发。

我想在此基础上，向在第一场发言的赵老师、张老师和榎本老师提一个问题。

今天的讨论中谈到，从近世到近代的过程中，通过主权国家的成立而确立的护照制度开始对人们跨越国境的移动进行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思考从近世社会向近代的这种转变呢？

就是说，那是连续的，还是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断层？以日本为例来考察的话，应该如何认知 19 世纪中叶从所谓“锁国”、“海禁”转向“开国”、“开港”的这个变化呢？这确实是与之后的“明治革命”相关的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但是，正如今天所讨论的那样，从行政与统治的观点来看的话，正因为近世期以来通过“海禁”的形式管制了人的移动，开港以后在导入西方的护照制度的同时也使得对跨越国境的人的移动的管理得以实现。所以我认为其中是存在连续性的。对此，希望可以听听各位老师专业的见解。

南基正

好的，谢谢。提问并不指向特定老师。刚才浅野丰美老师提了一个问题，现在通过聊天栏能看到该问题的韩语翻译。简单地说，就是“我认为，如果把蒙古帝国和日本帝国作为区分近世和近代的亚洲帝国来讨论的话，就能对古代、中世和近代有更清楚的认识”的问题和评论<sup>1</sup>，对此聊天栏中也有一些交流的内容。

1 浅野丰美（早稻田大学）写在聊天栏的评论（部分修正）：伴随着东西方交通发达的近世以及工业革命席卷全球的近代等新时代的发展，亚洲帝国（作为其先驱）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希望各位可以讨论一下蒙古帝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比较问题。如此一来，我想会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古代、中世、近代这一历史时期划分在亚洲以及在与世界的关系中是如何进行、及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这可以构成一条“融合与新文化的生成”VS“民族主义的勃兴”的轴线，也可以从盐出老师所评论的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做一个整体的视角重新审视整段历史。也就是说，可以找到将近代特有的主权与人权作为双方均不可或缺的存在来进行讨论的切入点。与此同时，以半岛为中心的岛国与大陆之间的地缘政治学的比较问题也能得到关注。还可以构成蒙古帝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学的对比轴。之前的蒙古帝国时期，蒙古在吞并高丽王朝以后，试图将帝国势力从大陆向海洋延伸，但在远征东南亚的三佛齐以及日本时失利。而近代的日本帝国则在与朝鲜半岛合并以后在亚洲大陆与俄罗斯帝国发生冲突，并因中国问题与跨洋而来的美国产生对抗，最终导致其在占领东南亚之后走向自我毁灭。可被视为蒙古与乌克兰的某种融合而登场的俄罗斯帝国与西方的勃兴，以及随之而来的主权国家等问题，也就能放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思考。

画面中出现的 6 个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讨论希望能继续下去。现在包括提出问题的浅野丰美老师在内,有意见的老师请继续提问。刚才佐藤雄基老师也举了手,请问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吗?好的,知道了。希望现在能继续讨论。张老师举手了吗?好的,那就拜托张佳老师了。

张佳

谢谢刚才大久保老师的提问,我回应一下大久保老师的问题。关于人的跨国界的移动,在古代的中国跟近代的中国对这个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古代的中国,更多地把这种跨国界的移动视作是一种不合法的,或者是政府不鼓励的行为。当然政府会有一些相关的管理规定,比如说中国沿海的商人可能到高丽去贸易,可能到日本去贸易,按照规定要到政府去备案。但还有一些是没有备案,民间私自往来的,对这些活动政府是不怎么鼓励的。这个观念是跟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念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古代有一个所谓“天下观念”,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自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高级的,所以老百姓就应该居住在中国,不应该到外面去。如果你自己跑到外面去,那中国皇帝会认为说,你这个老百姓是不求进取。用一句中国古话叫“自外于王化”,我把它写下来。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自愿地脱离文明社会,到野蛮社会去”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像在 17 世纪的初期,中国东南沿海有很多民众到菲律宾去谋生,后面西方来的欧洲殖民者跟在菲律宾的华裔发生冲突,有非常有名的马尼拉屠华事件,当时的西班牙人杀死了好多中国在菲律宾的侨民。这个事情有侨民报告了当时的明朝政府,请求明朝政府出面跟西班牙进行干涉。但明朝政府接到报告之后表示说,你们这些私自到马尼拉去的人都是“自外于王化”的人,你们受到别人的欺负是咎由自取,结果明朝政府不予保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古代政府对于老百姓到国外去的一个基本态度。

到了中国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天下观”变成了“万国观”,中国人意识到世界上不只有一种文明,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的移动被视为是合理的,被认为是合法的。我觉得这种演变不是一种渐进的演变,而是一种裂变,一种突变。这就是我对大久保老师的一点回应。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想提给赵阮老师的。赵老师是专门做蒙元历史的,我也有一部分研究是跟元朝的历史有关。赵老师提到,中国有一个民族的形成——回族——这跟蒙元帝国是有关系的。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对朝鲜半岛的历史不是很熟悉,在蒙元时代,朝鲜半岛、当时的高丽也曾经是蒙元帝国的一部分,几乎是一部分,因为当时高丽还有一个半独立的地位。在朝鲜半岛也有相当数量从中东、阿拉伯过来的色目人。这些色目人到元朝消失之后,有没有在朝鲜半岛他们形成一个有独特信仰的穆斯林群体?在中国是有的,回族就是元朝遗留下来的。在朝鲜半岛有没有色目人由他们的后裔演变成一个穆斯林群体?当然不仅有色目人,还有包括蒙古人。中国现在的内地,有很多数百年已经汉化了的人群,他们完全跟汉族一样,可是他们的历史记忆仍然会说我们最早的祖先可能是在元代的蒙古人。在韩国有没有这种状况?这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小问题是给盐出老师的。盐出老师在给我们演示 PPT 的时候,引用到了一个报纸,叫《檀华新报》。盐出老师用了 1926 年的一篇报道,里面标

题有一个词叫“劲敌”，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劲敌”的理解，恐怕不能把它理解成enemy那个“敌”，在1926年的语境里，可能这个所谓的“劲敌”指的更多的是一种有力的竞争的对手，可能跟盐出老师后面引用的1938年的史料，那个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很激烈了，与那个时候的史料使用的词的意思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小的疑问。

南基正 好的，谢谢。谈到了作为移动界限的天下领域，以及从“天下观”向“万国观”过渡的问题。现在的提问是面向赵阮老师和盐出浩之老师吗？首先请赵阮老师给予答复，并请跟进提问。

赵阮 大家好，我是赵阮。我先回答张佳老师的问题，因为对蒙古帝国有很多问题和评论，就浅野丰美老师和大久保健晴老师提出的问题我将给出三个答案。

首先，张佳老师提出了“关于色目人和回族，在高丽和朝鲜半岛有没有相关发现”这个有趣的问题。先从结论来说，自朝鲜时代以来尚无任何关于色目人和穆斯林共同体的史料记录。在高丽史中，高丽文集或史料中出现了“回回”的存在。虽然有同他们进行商业活动和交流的记录，但没有看到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史料证据或研究。据我所知，穆斯林的移民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之前的唐宋时期就开始进行了。当时移民到朝鲜半岛的规模很小，只是极少数个人的迁移，所以我认为其规模还没有达到形成共同体的程度。相关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进行过，以后我会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史料。

下面回答大久保健晴老师的提问。是关于连续性和间断性，即同为帝国，近代帝国的户籍、管理、规定、护照等诸物在前近代的蒙古帝国是否也存在过的问题。虽然我在指定讨论环节强调了自由移动，但实际上，蒙古在其统治下是严格执行户籍制度和户口制度的。另外，在欧亚的驿站制度中，能够使用驿站的人通过“牌子”，他们被赋予了移民和移动资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是存在管理系统的。尽管如此，商业交流和人们的移动在当时更加自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应的国家权力的控制比较和缓。而且蒙古向往的是商业帝国，在更加鼓励自由交流的氛围下，与其他时代相比，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管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虽然存在连续性，存在管制，但与此同时蒙古帝国时期也具有特殊性。

在聊天栏中，浅野丰美老师提到了蒙古帝国和日本帝国时代的比较，但由于我不是日本帝国时期的专家，因此无法做出明确的比较分析。我只能说蒙古作为一个帝国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帝国。从蒙古帝国之后的政治秩序的影响中，我们可以确认两种状况。首先是国家，即民族主义。各地区的新政权诞生，中华主义秩序等民族主义在中国明朝得到加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欧洲开启大航海时代，这也可以说是受蒙古帝国的影响。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帝国主义，其产物之一就是日本帝国。虽然很难进行单纯的比较，但从以军事体制为基础的军事、经济扩张的时代来看，我认为的是具有蒙古帝国的帝国特性的。在迁移和移民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南基正 好的，谢谢。刚才张佳老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据我的理解，这是对盐出浩之老师的提问，对吗？好的，那么请进行回答。

盐出 我简单回答一下,关于“劲敌”一词指的是“竞争对手”,这一说法我完全认同,我自己也是这样理解的。

张佳 刚才我已经听到盐出老师的回应了,我就想提醒一下盐出老师,可能“劲敌”这个含义,那个“敌”可能跟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的那个含义是不太一样的,我就做一点小的提示。

南基正 好的,知道了,谢谢。那么希望六位老师能按照提问中出现的主题继续讨论下去。好的,韩成敏老师,谢谢。

韩成敏 我是韩成敏。在今天的讨论中,移动和移居有种被混杂在一起使用的感觉,我认为两者是不同的。刚才我也说过,预定要回来的移动,换句话说,可能是旅行,或者是有其他目的的出差,但是近代以后的旅行也有相当休闲的部分。即使在外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回来的计划,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地方。因此,我觉得应该区分移居和移动。

当说到移民后的定居时,刚才盐出浩之老师对此并不是以“民族”的角度,而是以“种族(ethnic)”的角度来看待的。即便如此,我并不想否认祖国能带来巨大力量的事实。我们在韩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离开家会受苦”、“出国都会成为爱国者”等,类似的表述会经常被使用。但即使能成为力量,这样的国家真的会对所有移民集团施以恩惠吗?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虽然可能有多种目的,但基本上都是根据与移民居住国家的关系及其重要性,而对移民集团给予不同的待遇。就是说“十指咬着无不痛,但肯定有不太疼和非常疼的手指”。

这种国家权力在移居和移动上,能在国内自由地移居或移动,这应该是近代国家以后统治力的自信。正因为对广大区域的权力行使充满信心,所以它才成为可能,但如果跨越国境就无法进行控制了。所以一定程度的管控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国家是否会对那些完全超出底线的人负责到底,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不知道对此各位有何看法?首先向盐出浩之老师提问。另外,也想向都对近代进行评论的大久保健晴老师和秦方老师请教。

南基正 就区分移动和移居这个问题意识进行了提问,那么盐出浩之老师,从您开始简单回答一下可以吗?

盐出 感谢提问。关于移动与移居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点,我的看法与韩老师稍有不同,我认为实际上移动与移居是无法完全分离的。这与有无可归之处相关,以从日本移居到夏威夷或美国的人举例,他们其实并非没有可归之地。事实上大多数人最初是打算回日本的。实际上也有人是回来了的。因为回到了日本,所以很多人现在在日本有后代,但最终只是留下来的人现在被称作日系人而已。并不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回来,最初是打算回来的,或者对有些人来说往返于两地是最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才是全世界大多数移民的真实样貌。现在也是如此。就是说,在移居时就做好了不回来的打算,这只存在于难民等少数情况,而大多数情况实际是不断往返于两地之间。哪怕事实上变成了只有去程没有归程,

我也认为当初大多数人还是有回来的打算的。所以只是那些偶然留下来的人成为了所谓的移民而已。对两者进行严格区分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我认为我们只是知道了结果而已。

南基正 好的，谢谢。大久保健晴老师，请问您有其他意见吗？

大久保 我想就关联着刚才韩老师的提问来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盐出老师讲到了“族裔 (ethnic group) 以超越国家 (nation) 的方式移动”。但是，正如“国家 (nation/state)”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我认为“族裔”这个概念也是一个虚构。在第一场中我们讨论到了从中世到近世的时代，我认为在那个时代应该还不存在“族群”的观念。那么，盐出老师在思考移民问题时，为什么认为“族裔”是最小范围呢？这是何时才出现的呢？您认为是从古代就一直存在吗？请您不吝赐教。

南基正 好的，现在不断有人提问，如果能简单回答的话，还请简要作答。盐出老师？

盐出 我简要回答一下。我并不认为族裔 (ethnic group) 古代就有之。在古代有类似的存在，但现在存在的族裔，或者基于种族 (ethnic) 的身份认同 (identity)，我认为是在 19 世纪以后，也就是在近代国家中进行的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归属意识的结果。如果说那是一种虚构的话，也确实如此。但是，民族意识或者身份认同虽说是一种暧昧不明的意识，即便是暧昧不明的意识，我认为那也是真实的。要说它是虚构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人的虚假意识也是具有一定程度真实性的存在。

南基正 好的，谢谢。预定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尽管如此，在六位指定讨论者中，仍有两位老师完全没有发言。在结束之前，对于截至目前的内容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应该如何进行把握的问题，还请两位简单总结一下进行回应。先请秦方老师简单地说一句可以吗？

秦方 感谢。也是一直在听各位老师的发言。那我觉得最后在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 nation 的这个概念，以及包括民族，nationality 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几位老师的探讨，都是各自有道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实证研究出发所得到的一种概念。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想要形成一个更加有可讨论的空间，那么就首先确定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或者一个怎么样共同认知的知识体制之中去澄清这些概念。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讨论起来会更加有效一些。我就这样有个小的评论，谢谢。

南基正 好的，谢谢。下面请榎本老师简单整理一下发言。

榎本 在思考移居和移民等相关问题时，在近代背景下，背后一定有国家存在，这是无法忽视的。但若在前现代情况恰恰相反，不存在以国家介入形式的移民。首先，国家之间不一定存在共识。因为相互确立邦交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便存在共识，也

多是伴随外交或贸易的暂时的移动，他们当时是互通文书进行联络的，但却不能向对方国家提出让本国国民住过去的要求。比如说，虽然蒙古曾在高丽驻扎过军队，但一般是不能要求别国允许自己的军队前去驻扎的。所以反过来说，前现代人的移动具有国家无法介入的性质，所以正是商人、难民等的自发移动才让人的移动成为可能。在前现代，日本人町等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国家之间共识的前提下承认人的移动的世界是到近代才出现的，而没能做到这点的可能就是所谓的前现代时期，我或多或少有种这样的感觉。以上就是我的发言。

南基正

好的，谢谢。我认为无法简单总结便是目前到第二场为止的结论。可能是因为我的一部分想得不够深入，所以我觉得我之前的想法非常平面化。我再次意识到，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不可以离开特定的历史脉络与区域。

我认为，移动行为实际上是将界限可视化了。界限并不意味着它只以一个存在为前提，因为有界限所以有他人也有自我，现在也有老师提出，这一共存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部分。刚才的讨论中出现了很多话题，如国家历史、跨国历史、全球历史等，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到与国际历史相关的讨论。因此，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我个人似乎也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移动的问题和国际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另外，近代民族国家和帝国等这些各种所谓的全球历史中的行为者问题刚才也有所提及。

在结束第二场之前，好像揭开了很多问题，我对此深感抱歉。不过我相信在第三场时，刘杰老师会更明确地将问题进行整理，然后继续将讨论推进下去。希望各位午餐用餐愉快，第三场将于 13 点半开始。午休时间有所缩短，我们在吃完午饭于 13 点 30 分集合，继续进行下午的讨论。各位辛苦了，谢谢大家。

## 第3场

## 自由讨论2

主持人：彭浩（大阪市立大学）

论点整理：刘杰（早稻田大学）

成员（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市川智生（冲绳国际大学）、大川真（中央大学）、  
佐藤雄基（立教大学）、平山升（神奈川大学）、浅野丰美（早稻田大学）、  
沈哲基（延世大学）、南基玄（韩国独立纪念馆）、  
金囿泰（全南大学）、王耀振（天津外国语大学）、孙继强（苏州大学）

[以母语发言]



彭浩

各位大家好，现在是日本时间下午1点半。我是第三部分的主持，大阪市立大学的教员彭浩。我们接下来下午的时间主要是自由讨论的时间，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由我担任主持，第二部分由我们高丽大学的郑老师担任主持。大家能不能听到我现在的讲话？没有问题吧。我们下面的部分首先是请刘杰老师做论点整理。在此之前，我想再强调几点。有些老师可能上午没有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上午已经强调过，因为同声翻译的问题，我想再补充一下。第一点，接下来自由讨论的时间，请大家发言的时候先举手，然后由主观点名之后再请大家发言。发言时，请使用母语，并打开视频。开始发言时，首先请告知大家各位发言人的姓名，所属单位，以及使用的语言，以便进行同声翻译。另外，希望大家的语速尽量放慢，我们上午的时间可能讨论比较紧张，所以大家的语速自然不自然地就越来越快，有这么一种现象，下午的时间请大家尽量放慢语速。然后，我们遇到一些专有名词、人名、地名，最好写在纸上，像上午一样在这个视频上给大家看一下。或者利用对话框，聊天功能，发表你的意见。一般参加者可能只能在对话框中发表意见，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特别是在下半部分，有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这些问题总结一下，看看能不能请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老师做一下补充。接下来的时间，请刘老师进行论点的整理。

## 论点整理

刘杰

谢谢主持人彭浩老师。我非常感谢今天上午盐出老师所做的主题报告，还有各位老师今天上午所做的精彩的发言和讨论。各位老师在发言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很多个方面和角度，我没有能力去概括或者归纳各位老师的发言的全部内容。说是论点的整理，那么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对我所听到的各位老师的报告以及各位老师的讲评内容，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感想，并提出几个自己的想法。



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历史，说到底也是人们在这三个国家之间移动和交流的历史。如果离开人的移动这样一个历史视角，可能我们也就无法书写中国和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我们知道在近代中国的革命以及近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中，都离不开一大批中国人移动到日本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更离不开大批的日本人移动到中国的东北——也就是当时说的“满洲”，以及中国大陆。影响现在的日韩关系的因素，当然也包括殖民地时期的日本对韩国的统治和人的移动。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各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并没有正面地去书写。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我们的“国史对话”讨论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下面就以盐出老师所提出的三个问题为中心，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做一个梳理。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我做的一个简单的记录（图片从略）。盐出老师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人的移动”、“人的移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想。一个是移动者，移动的这个人，他的想法，他的意志，从这个角度去想。关于这个角度，既有刚才赵阮先生提到的自发移动，也有非自发移动，移动者的移动有的靠自身的意志，有的完全不靠他自己的意志，它是可以分成这两大类的。

人的移动不单单是靠自己的意志去决定的，它还有很多外部的条件。外部的条件和人的意志结合起来，才造成了人的移动。那么，外部的条件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分析。一个是国家的政策，另外一个就是跟政策也相对有关系的，或者说影响政策的一些因素，包括战乱、灾害、贫困。战乱和灾害可能是一种有时间限制的内容，但是贫困，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外还有疫病，这些都是造成人要离开自己本来生活的地方去移动的外部的条件。

那么到移动过去之后，他们从事哪些活动？比较多的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类。其一是去从事劳动，其二是留学。近代以后，占有很大比重的是留学，而留学又引发出很多相关的问题。劳动和留学之外，当然还有所谓的各种交流的活动。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还有因为家庭、婚姻等问题而进行的移动。那再有一种就是所谓的难民，离开前往移动的国家去并不是说有什么目的，他只是作为难民到达一个地方。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在思考人的移动会受到哪些限制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的。

盐出老师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人的移动带来了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也可以从几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刚才秦方老师讲到周边化的问题，那么就造成了母国和“移民”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变

化。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种问题，就是到移动过去以后，在当地的人和过来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演变，又会带来这样一个影响。同时还应该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移民本身，当他们移动到一个地方去之后，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种族群的变化。因为他们各自的身份、经济状况等等，他们之间也许会产生一种联合、对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也是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比如，中国的移民到外国去，各个地方都会有各个地方的同乡会这样的组织。这种同乡会的组织对于这些移民所产生的影响值得关注。那么至于和本国的关系，这个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在历史上，移动到日本的人很多变成了革命派，还有很多人就融合到了当地的社会当中，等等。另外比如说，现在还有很多移动到美国的中国人，他们的活动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甚至成为美国政府的顾问。所以人的移动又带来了这些人和本国、还有移动到的这个国家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视点。

盐出老师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各个国家的教科书当中对于人的移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中国的教科书我也不是十分地熟悉，它可能不是从人的移动的角度去书写的，但是在有些环节中会提到移动到国外的中国人。提到这些中国人的时候，往往都会以爱国的角度，或者革命的角度，还有民间友好的角度，或者对于当地的贡献的一些角度等等来书写。从这些角度会提到一些移动到外部的人，但是实际上移动到外部的这些中国人的活动范围，不只停留在这几个范围之内，而是要远远超出这几个范围。在日本的教科书当中我们也许可能看到遣唐使、遣隋使这样的一些历史上的人的移动。在近代则有包括像美国的排日移民法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叙事当中偶尔被提到一些，但是并没有关注这些移动的人的群体生活状况。

最后，第四点我想讲一下今天我们来讨论人的移动这样一个历史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问题。尤其是近代以后，人的移动的原因、状况还有它的影响，到底对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和国民（近代以后的话就是国民）或者说移动的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全球化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对于“国家”的概念、“国境”的概念还有“民族”的概念会有何种不同的认知。因为刚才盐出老师用到日语的“民族”这个概念，但是他又讲到了这里面所用的“民族”可能跟我们汉语里面的“民族”的概念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他是说 ethnic group，我不太有自信汉语是不是可以叫作“族裔”这样的概念，而不是“民族”这样一个概念。“民族”这个概念在近代以后，中国往往是在对外讲到生活在中国的人的群体的时候，比较习惯用“民族”，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在遇到民族的危机的时候。所以，近代以后，中国把中国的对外危机一般都称作“民族的危机”。这是中国所说的“民族”的概念的意涵，它跟“国家”当然又是不同的意思。所以，今天我思考，刚才的盐出老师的发言里面讲到的“民族”，应该比较接近“族裔”这个概念。

另外还有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大久保老师提出的人权和主权的的关系，就是人的移动所造成的人权问题，也许是当今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样化社会的构建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现在都会有很多移民过来或者是流动过来的人。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如何让这种多样化的族裔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应该可以从历史当中找到很多的答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刚才各位老师讲到“移民”、“移动”还有“流动”的概念的

问题。我想也许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尤其是随着“近代化”和“民主化”的推进，移动也许将来会向流动的方向发展。就是人的移动往往是在到达一个地方之后，有相当一定时期它是稳定在这个地方的，但是流动也许是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也许经常变化的这样一个移动的方式，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流动的主流。

所以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肯定是跟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国家和国民之间的关系，人权的问题，还有社会的多样化的问题都联系在一起的。那其实在历史上，尤其是在近代史上，这些问题我们都接触过，有的时候处理得很好，有的时期就处理得很不好。这也是我们通过对话，通过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更加清楚的理解，为我们今天思考人的移动提供一些参照的意思。

在下午的讨论当中，如果能够从以上这几个角度进行一些更加具体的讨论，我想对于我们这次的对话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我就到这里。谢谢。

## 自由讨论

彭浩

谢谢刘老师。刘老师给我们重申了这次对话的意义，还根据盐出老师提出的几个问题，重新做了补充，并进行了清晰地解释。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很多可以讨论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跟以前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以前的形式的话，经常请每一个参加自由讨论的学者轮流进行发言，这次我想分成几个板块，分成几个主题进行。我看到对话框里已经有些老师准备了自己的发言稿，像平山老师、大川老师，很抱歉。根据我们的主题，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观点穿插进来进行发言解释。

关于我们分成哪几个板块和主题，我们就根据盐出老师提出的问题和刘老师刚才的论点整理来划分，因为基本上也是同样一个顺序。我想第一个可以是促成人口移动的要素，比方说在东亚地区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大规模的人口的移动，为什么要移动，有哪些因素，前面有几位老师提出了政治要素呀，经济因素呀，宗教因素。还有选择去哪里移动，到了以后要做什么活动。这些选择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或者另一种说法说，是强制的还是自发的。三国有何共同点，有什么共同的潮流或者说共同的节奏感，或者反过来说有什么很明显的不同特征，有什么相互制约的因素。比方说在近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差距，像日本近代化进程比较快，形成了所谓的帝国，在移动方面考虑的话，反而对中国和韩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想我们第一个板块、第一个主题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些问题来进行讨论，包括刚才刘杰老师讲到的第一部分中的一些具体的话题。哪些老师希望发言的话请直接举手，请使用系统的举手功能。我已经看到了，谢谢。根据我看到的顺序，先请平山老师进行发言。

平山

我是神奈川大学的平山升。我事先准备了两点评论，其中的第二点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要点相关，所以我想先谈谈这一点来回应一下主持人。

我们在思考人的移动时，不应该将其限定在近现代以及特定的国家、地区，而是应该将其视为人类的普遍问题，所以我觉得宗教是一个很好的着眼点。

张佳老师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世史中大规模人口移动的主要原因进行了阐述，但正如主持人提到的，我认为从“宗教”方面进行思考

也会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从榎本老师的报告中了解到中世时期人口从日本向大陆（中国）移动的动机，其中佛教因素最为重要。

此外，韩成敏老师对跨国主义与流散（diaspora）的分析中“宗教”都是重要的路径（approach）。因为宗教会带来不同于“国家”和“民族”的“交流与区隔”。拿日本历史举个例子，日本人对江户时期的隐匿吉利支丹（隐匿基督徒）有过非常残酷的镇压，并且对隐匿吉利支丹的歧视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在排斥移民问题上，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日裔移民被强制关押，持续对其施以援手的是犹太裔美国人中的佛教徒。另外，大久保老师提到的难民问题上，以非政府组织形式活跃在第一线的也是宗教人士。

我在此想向各位传达的是，事实上宗教研究者们一直都在非常活跃地进行跨国的研究交流。但可惜的是，我感觉非宗教专业的研究者中存在不重视甚至无视宗教的倾向。我认为，即便不以宗教作为研究对象，但宗教仍是在思考移动、移居的历史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以上就是我事先准备的评论，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彭浩 谢谢平山老师。平山老师主要给我们补充了一些宗教和难民方面的重要因素。大川老师也已经举手了，请大川老师发言。

大川 我是日本中央大学的大川。我事先准备了评论文章，如果时间充分我想就其具体讲一下。但首先我想谈一谈讨论时的注意事项。今天的小组成员中可能只有我是哲学出身的教员。从哲学的观点来说，彭浩老师刚才举出的第一个观点中提到的自发性与非自发性这一区分，虽很重要，但我觉得并非能简单地将两者进行划分。就是说，自发性或非自发性这一区分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是无效的。现在，在政治哲学中经常谈到“中动态”这个概念。我想简单解释一下，在外人看来，药物依赖患者是自己选择去吸食毒品的，但实际上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状况使得他不得不这么去做。就是说，表面上看来是自发的，但因周遭影响实为被动的或因其他因素而不得不那么做，这个状态即称为“中动态”。那么在“移动”方面，确实存在因国家命令而产生的移动，但更多情况，比如因为在日本生活难以为继，于是前往东南亚或者中国、朝鲜半岛生活。对于这种状态，我认为并不能简单地区分其为自发性的或非自发性的。哪怕那个人是欢天喜地毅然决然地移去他处，我觉得也难以说那是自发性的。就是说，如果国家在经济政策或者社会福利方面提供了一个足够健全的环境，那可以说是自发性的，但对于在上述环境并未实现的情况下发生的移动，我认为无法简单认定其为自发性的。以上就是我的发言。

彭浩 大川老师发言结束了吗？还有没有补充？以上就可以，好的。谢谢大川老师。大川老师的发言对我们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当初我也想到今天参加的讨论者当中政治史的专家比较多，可能其他方面会有许多忽略，正好大川老师是哲学方面的专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线索。这也促成我一个想法，刚才大川老师提到很多日本人为维持生计到南洋或者满蒙地区去。因为我现在教经济史的课，经济方面的原因其实也值得关注，比方说到了18世纪后半期，东亚普遍人口密集，所以说需要找到工作。所以说在清朝中期以后，又出现了大量到东南亚迁移的趋势。可能

更早就有这个趋势，到清朝中期以后更加明显。进入近代之后，中国、日本、韩国有同样这种趋势。所以说谈到东亚地区的移民的时候，往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migration，到海外去的这种倾向，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节奏（rhythm）。我看到浅野老师和刘老师举手。先请浅野老师发言好吗？

浅野 谢谢。我在波士顿的剑桥，现在是夜里 1 点钟。今天的会议给我提供了深思的机会，真的非常感谢。

在第二场讨论中，我也在聊天栏里写过，我认为，从帝国这一存在如何利用人的移动的观点出发，可以探讨近代以前与近代以后不同性格的帝国之间的某种共通性。蒙古帝国利用色目人，将其用于商业发展与交通线路开发。而日本帝国则雇佣外国技术人员，学习西方技术，派遣留学生，以及将伴随农村近代化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送出国外移民。我们可以看到在总体战时期有以下这样的结构：通过确保朝鲜精英合作者，日本将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在朝鲜社会被更加边缘化的农村，通过“强制连行”的方式人为地引发了人的移动。这里便具有盐出老师所说的被强制的人的移动的面向，不过，当国家采取某项政策时，民众一方的确也会有（为应对该项政策的）自发的对策吧。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确实存在明明是呼应国家政策，但民众却自下地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举动，而在两极之间则存在大川老师所说的中动态，即存在无法判明有多少自主意识起作用的、说不清是自发还是被强制的人的移动。30 年代满洲国成立以后，以官方斡旋的方式所引发的向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日本社会流入朝鲜劳动者的现象，我认为应该就可归于此类。总之，生活在近代的我们，惯于以国民、民族古已有之为前提进行思考，但我认为有必要在此类意识尚未成熟或尚未成立的前提下对人的移动的现象给予关注。人的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进行客观把握的部分比较多，当然，像中动态概念所象征的那样人的意识部分是难以被把握的，但哪个阶层的人移动去了哪里等这类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是可掌控的材料。使用这些材料，我认为可以为我们提供从迄今为止的全球史中进行国民形成的动态原理的提取这一新课题。一直以来，我们通常是基于传染病，比如霍乱等一类易于理解的对象，去描绘全球史的。但这次会议的尝试则是以人的移动为主轴描绘全球史，反倒使人的移动这一现象成为了让我们看到一直以来被近代的滤镜所遮蔽掉的面向的切入口，这一点便是我最想表达的。

从推动东西方交流的观点来看，蒙古帝国作为近世的先驱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还有，日本帝国是如何通过利用留学生以及雇佣外国人导入西方文明与生产力，从而成为亚洲内发性近代化先驱的呢？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我们可以将想象的触角伸向盐出老师提出的“国家 VS 社会”这一框架中近代国家与社会之外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更能够去除我们视觉中被近代所污染的部分。

再补充一点，平山老师指出的宗教的功能在近世以前与中世以及近代也有很大不同，其间的近世确实如此，从宗教功能的观点出发，我认为也可以在宏观的历史中将近代进行相对化。

简要总结一下我想表达的观点。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人的移动，对于人的移动如何被国家管理，以及其如何规避国家的管理，人是如何移动的等实证问题，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只通过事实考证把玩这些事实，以易于向一般社会传播的形式，它可以成为探讨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相关问题时的一个更加客观

的基础。它还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近代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我们经常会在意识不到现代意识形态和近代特殊性的状况下简化所谓的历史教训加以使用，而本次的讨论主题则可被看做让我们避免犯下此类错误的材料。不管是自尊还是自虐，我认为可以通过具体数字去接近那个成为心理基础的东西。

此外，中国的秦老师指出，如果我们的讨论不建立在明确的概念的基础之上的话，那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就变得难以理解，对此我深表赞同。关于这一点，我也想从相同的角度提出相关问题。关于如何看待琉球王朝和冲绳人的问题，在全球史中，我认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认为“冲绳”人和“大和”人通过近代进行了民族融合，但若就要就此问题进行严肃讨论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脑子有问题的奇怪学者。而这足以证明，在我们的情感中渗透了认为作如此发言的学者是不正常的，这样的价值判断、常识及道德观。但是这类价值判断给研究造成了某种禁忌，产生了把特定主题立为研究对象变得困难的现象。与此类似，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讨论台湾问题时也有一定的难度，如此，大家应该明白，通过禁忌，形成了所谓国民的社会。这种东西其实也在研究者的内在发挥着影响，但我认为，通过思考移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将这诸多禁忌或感情本身作为历史产物进行超越的基础上构筑一个可以进行对话的共通的基础。所以张老师谈到的曾经存在过的色目人社群以及因此形成的新的社群的内容，以及蒙古帝国的相关话题，对我来说都非常有意思，但我认为这样的社群形成与变迁也可以对应到近代。

在近代日本帝国的案例中，反抗日本统治的人们努力建构不同于日本的中国或朝鲜的国民身份，开展独立运动，最终将日本帝国粉碎。也就是说，通过人的移动，有时人们会创建新的社群，建构包括国民在内的庞大的新的集体，与此相对应，有时则会通过独立运动而引发分裂。我想向各位研究蒙古帝国的老师们请教，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动态原理。

比如，从高丽王朝以前的新罗时代遗留下来的中亚面孔的人物铜像表明当时的人们与色目人有过接触。我去过曾是新罗首都的庆州旅游，当时我看到了正在展出的那个铜像。以7世纪中期的女王为主人公的现代韩剧《德善女王》，就是以此为史料，在剧中描绘了前往中亚与色目人接触的情景，而那个铜像的存在也说明剧中情节并非完全虚构。古代的时候，人们的交流也是非常活跃的，当然那也与古代王朝的攻防密切相关。

通过这次的研讨会，研究近代的学者们也体会到了古代中世的魅力。通过借鉴研究古代和中世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所受近代产物毒害程度之深，以致忽视了本应看到的众多面向。我觉得这是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不知大家意下如何。非常感谢。

彭浩

谢谢浅野老师。浅野老师给我们丰富了很多话题，其中特别提出了帝国方面以及近代化的过滤问题，还回应了我们刚才已经出现的问题，比方说国家如何进行管理等。特别是在浅野老师发言的过程中，提到过日本帝国与蒙古帝国之间的比较问题，我想这个话题非常大，可能跟我们接下去的很多板块、很多主题都有关系。但就第一个板块来讲，比方说这种到什么地方去移动，在移动到的目的地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活动，根据这一点来讲，不知道做蒙古帝国史研究的学者有何回应，如果有

这方面意见的话,是否可以请张佳老师或者赵阮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补充,张佳老师?

张佳

好的,那我来大概说一下,因为我做元朝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蒙元时代可能是进入汉族地区,进入中原地区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时期,有各种各样的族群,包括从北方来的草原民族,东北地区过来的民族,也有从中亚过来的,从西亚过来的,甚至有从欧洲过来的很多族群。大概出现在中国史书里的色目人如果仔细划分的话可能划分出有接近50个族群过来,所以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

这些人来到中国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战争的影响,蒙古人在西征的过程中,曾经俘虏了一大批的外族人,他们加入了蒙古的军队,他们在蒙古跟南宋作战的时候又陆陆续续地到了中国的本土,这是一部分。另一个因素是商业因素,前面很多老师也都讲过,有很多色目人在中国是做斡脱商人的,赵阮老师特别提出过,在中国来经商的。最有名的马可波罗,可能在座老师都知道,他的《马可波罗行记》曾经在欧洲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马可波罗的身份就是一个意大利来华的商人。很多研究者推测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真实身份,就是受雇于蒙古皇室的,替皇帝来做生意的商人这样一个身份。当然在蒙元时代,也有一些是,我们下午讨论的时候也有几位老师特别提出的,是基于宗教因素到中国来或从中国出去的,比如说,那个时代从欧洲就有天主教的传教士,那个时候欧洲天主教的教皇想跟蒙元的政府建立联系,所以派出过好几个使团到中国来传教,来建立关系。也包括一些伊斯兰信徒,他们从中国出去去外面去朝圣,这跟宗教交流也是有关系的。

总体来说,蒙元时代政府对人员流动的管控似乎不是那么严格,赵阮老师刚才提到过一个观点是说,元代使用驿站,驿站是政府专门设立的给往来人员提供马匹、住宿、食物的官方机构。但使用驿站的主要是限于官方人员,还是有特定身份的官方人员,这一般不是面向老百姓的。老百姓有自己的渠道,比如说要自备马匹,找旅店住宿等等。但总的来说,元代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似乎不是那么严格。

但是明代就不一样,明代的管理,从制度上讲——当然实际上是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从制度上来说,明代对于人口流动的管理非常之严格,中国现在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当然现在的户籍制度在中国也开始慢慢地在松动,往上追根溯源,大概可以把它追溯到明朝。现代汉语里还有一个词,名字叫“籍贯”,我把它写下来。我们依然在用,包括我在中国有时候要填写一些表格,表格里有一栏叫填写你的籍贯是哪。这个词就是从明代来的。“籍”本来的意思是你的工作种类是怎么样的,这个概念是从元代继承的,这个可能跟日本有点像,元代规定老百姓分为不同的职业、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说有的人是军户,你的家族世代要出一个军人,有的人是匠户,要承担手工业的某个种类,这个概念是从元代继承来的。明代特别强调“贯”,“贯”的意思跟“籍”是不一样的。“贯”的意思就是你的出生地跟居住地,这个跟很多制度相连的,比如说明代的科举制度,特别强调考生不可以到自己本贯之外的地方去应考,比如说我是一个山东的读书人,那我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要在山东考,你不可以跑到河北,更不可以跑到北京去考。这个制度到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今天中国有一个词叫“高考移民”,也是政府所反对的,你必须要在本地参加考试,这是跟很多资源分配相关的。明清时代相对来说对人员移动限制比较大,制度上如此。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虽然政府管得很严,但由于生存压力,彭老师刚才说过经济压力,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从明代就开始到国外去谋生。最明显的是福建地区,

福建地区人口很多，而且福建地区一个特点也是山多地少，很多是山，没有平原，没法进行耕种。所以从晚明开始，有大量的中国人到东南亚去。当时也有政府官员向朝廷上书，要求开放海禁，鼓励福建的人员出去。当时中国的世界观依然是天下观，这个观念没有被皇帝接纳，出去的人依然被朝廷认为说你是不服从中央管理的，所以他们在海外受到了欺负或者怎么样，是不会得到当时朝廷的支持的。我就简单说这么多，好像说了很多了已经，谢谢各位老师。

彭浩 谢谢张佳老师，张佳老师提出的很多问题跟前面的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我想到了户籍制度，张佳老师的发言中不只一次提到户籍制度，特别重要。户籍跟现代的中国的人口移动有关，我想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日本还有对韩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里面做古代史研究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大家非常关心近代史的研究。刚才提到的户籍制度，张佳老师说明朝户籍制度开始，然后我因为知识不太健全，以前根据我的想法来说，秦汉时代，特别是商鞅变法以后，就开始对人的移动有很严格的控制，我不知道当时的术语叫什么，或者说编籍控制他的移动，如果有问题要进行连坐，后来还有保甲制度，包括接下来我想跟其他老师会进行分析的通行证的问题，这些可能在秦朝就有一定的跟后来明朝的户籍制度相关的一些制度开始实施了，我有这样的一种印象，不知道对不对，请张佳老师指导。

张佳 对的，确实是秦汉时代对老百姓的流动就有一种约束。但是一般来说约束那么严格可能还是从朱元璋时代开始的。朱元璋是一个对社会管理极其细致的人，明代老百姓出行要有一个特别的凭证，而且离乡 100 里，不是一个太远的距离，相当于现在大概 50 公里，你就必须要开具路引，说明为什么要出去，这个要到县里去开具证明，要盖章的。像这种制度可能之前都没有这么严格，但明代，从材料上看，前期确实是管理得很严。当然这之前可能有一个比较悠久的历史，可能从商鞅时代就开始慢慢地控制老百姓，毕竟说限制老百姓流动是跟政府赋役来源是有关系的。如果老百姓控制不了就没法向国家提供相应的兵役和徭役。这是我的一点回应。

彭浩 谢谢张老师。刚才我也说了，待会儿可能有这方面更具体的一些讨论。刚才张佳老师多次提到路引，包括我在内，我们这里有好多对通行证，对 passport 非常感兴趣的老师。等第一环节结束以后，第二环节我们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现在我看到浅野老师又举手了，可能有些回应，请浅野老师发言。

浅野 张佳老师，彭浩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我博士论文也是写近代日本帝国通过户籍管理人的移动这个主题。区分户籍种类，根据管辖区区分内地与外地，通过以总督这一行政官为中心制定委任立法制度，以此定义台湾、南桦太（南库页岛）、朝鲜等领域，将依据其委任立法的朝鲜户籍与基于内地帝国国会的户籍法进行区分，以此将差别对待以合法方式导入。在利用私法上差别对待的同时，也关联至与公务员工资等相关的公法，在经济层面与教育层面（手段不同）则宣称同为日本人，进行同化。其中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但为什么可以成立，我的博士论文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帝国日本的殖民地法制：法域统合与帝国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社））。

此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例子。之前我上三谷博老师的课的时候，课上讲到在江户时代，在幕府这个国家的命令之下，旗本或通常的大名更换领地，随之而来的是以由官僚化的武士们构成的“御家”为单位的人的移动，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但三谷老师评论说，即便如此在当时依然有20几个以藩为单位的领地未能被撼动，我对这一句印象十分深刻。但到了近世，除了岛津、长州等几个在明治维新时期非常活跃的大的藩以外，江户幕府几乎可以变更所有官员的任职地，根据幕府的命令武士们必须进行移动。所以我想反过来请教张佳老师和赵阮老师，人们都说明朝是汉族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而建立的王朝，刚才也有老师评论过明朝的建立表明了汉族的民族主义的存在。在蒙古帝国完善的体系之中，以朱元璋为中心，为什么汉族能够引发叛乱？在蒙古帝国末期是否存在对人的移动的限制与歧视，以及像朱元璋所实施过的那种严格的限制？日本的教科书中会涉及蒙古帝国中存在的色目人与汉人之间的区别以及阶级差异，那么人的移动的制度性限制跟明朝的建立与繁荣之间有没有关系？我有了这些疑问。我知道现在在这里很难展开详细的探讨，但我认为人的移动会对人的意识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感到受到歧视而产生的愤怒，具体可以是出自限制人的移动的制度，我们作为国民在各自的记忆中会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记忆历史事件，为了对此进行调和，我认为可以通过将移动的限制与感情进行结合，使之成为抽象感情以外的具体史料，从而促使我们探讨各自国民历史认知差异的相关问题。非常感谢。

彭浩

谢谢浅野老师。浅野老师刚才也提到过对做蒙元史研究的老师的一些问题，还是涉及到国家对移动的一些管理，还有对人口掌握方面的一些情况。我想第一个板块可能讨论的时间有点过多，在第二个板块里面我们同样会涉及到这个话题。

第二个板块我们想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就是更具体一点，国家对于移动的管理，更具体一点，特别是对移民的政策和出入国的管理制度。因为我刚才也稍微提到过一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有好几个老师都对通行证的研究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好多是研究前近代的老师。我想简单梳理一下，从中国的古代比较早的时期出现的对人口移动的限制政策，通行证，一直到近代时期，以及我做的明清时期的政策，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因为要参加这次会议，对人口移动比较感兴趣，所以看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纪录片，documentary。在里面看到比较早的有秦朝出土的竹简里面，有谈到秦朝从商鞅变法开始以后，开始有了对人的移动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其中比较早的这种通行证叫做“传”，当时就有了通行证，具体的制度，因为当时竹简里面记录的非常简单，所以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汉朝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这种通行证出现，资料相对比较多的是唐朝，到了唐朝以后，有叫做“过书”或者“过所”这种通行证出现。对于这一点，我想做古代史的老师，郑淳一老师可能在这方面更加了解一些，所以我可不可以请郑淳一老师在这方面做一下补充。郑老师能听到吗？

郑淳一

好的，彭浩老师，谢谢您的点名。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渡航证明书，因为刚刚提到了古代的出入境管理制度，以及期间使用的通行证问题，所以我拿平时给本科生上课时使用的几张幻灯片进行回答（图片从略）。

请问画面被共享了吗？有韩文和汉字混合在一起，是很简单的内容。我拿古代

内容举个例子，刚才榎本涉老师在指定讨论中，提到了日本和唐朝，即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往时使用的通行证，也就是“公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在古代韩日关系中通行证是如何在史料中被记载的。首先是第一张幻灯片，在《续日本后纪》这一史料中，就提到了新罗人在去日本时会被询问有无携带“文符”，还有就是会被确认有无携带叫作“牒状”的文书。

接下来是第二张幻灯片，内容是日本人在前往唐朝，也就是移动至中国的事例。正如榎本涉老师所说的那样，当时是带着“大宰府公验”去的。刚才三谷博老师在聊天栏里也有提到，希望到时候能从榎本涉老师那里听到更多的说明。那我先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在这份名为“公验”的文件中，既有身份证明的内容，也就是与现在的护照类似的内容，也有人员名单。也就是说这不是针对一个人的公验，而是针对集团，即所有乘船人的公验，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高。上面附有描述乘船者为何人的人员名单，以及船上货物的清单。另外，刚才彭浩老师所提到的“过所”文件好像也起到了通行证的作用。

最后是第三张幻灯片，我认为日本人在前往新罗，即韩国时，是必须随身携带“公牒”的。画面上看到的是名为“新罗国执事省牒”的文书手抄本。有“高柳本”、“谷森本”，以及江户时代的“庆长本”等存世。将其翻录下来，就会是这样的文章。例如，抬头处写着“新罗国执事省牒”，新罗国的“执事省”指的是负责外交文书的重要官府。上面写有“执事省向日本太政官发牒”，而在该文书中被重视的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公牒”。

但有趣的是，在判断该公牒的真伪时，会看公牒上面的印章和印鉴。这里写着会查看太政官的印章是否清晰来辨别真假。这就是“太政官印”，这张图片是古代太政官印的复原图。在新罗，即古代韩国会对这些印章上的文字是否清晰进行确认。更有趣的是，因为需要携带这些文件，所以没有得到从日本出航到韩国的许可的人们便偷偷学会了制作官印和印章，伪造出了假公牒。可以确认存在过制作伪造渡航文书进行海外渡航的事例。我想其他老师还会介绍类似的事例，所以我就先到此为止。

彭浩

谢谢郑老师详细的解释。然后我们进入中世。中世的话，刚才榎本老师已经做了一定的介绍，不知道榎本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比方说在日本国内，或者在中国国内通行用的通行证方面，榎本老师是不是还有补充？榎本老师可以听到吗？刚才榎本老师已经介绍了“公验”，我们了解一下在日本的中世，有没有其他的比方说日本国内的一些通行证，还有到中国去以后，中国国内的一些通行证方面的信息？

榎本

关于日本国内，在日本曾发行过“过所”，有了它，在过关所时可免除费用。

我想先回应三谷老师对我的评论。三谷老师的提问是：“由国家管理开具出入境证明书以及身份证明书这个观点确实很重要，但僧侣一类的精英之外，比如水手（划船工人）们的权利是如何被保障的？”这一点关系到从日本出国的相关手续。关于从日本出国的人们的身份保障，像遣唐使或遣明使一类的国家使节，肯定是有相关举措的，但对个别人员是否会一一核实姓名，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或许，使节中的干部在前往目的地国家时可能会发行相应文件，一般资料中可能只会记载同行的人数。即便能知道人数，但未必能掌握个别人员的具体信息。我认为在前现

代国家中应该还不具备这么细化的管理机能。

那么，除遣唐使或遣明使一类的国家使节之外，其他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刚才提到过的大宰府公验中，记载有乘船者的名字和年龄等信息。但这些仅限于去往中国的僧人及其随从。并没有提及船员。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时期的船员都是对方国家的国民。联通日本与外国的海船均为外国船，当时日本的贸易船并不存在。外国船来到日本，然后只是归航，不存在由日本政府对船员进行保障的情况。之后，进入镰仓时代后日本人也开始以船员的身份乘船出海，但那时的日本并未对与国外之间的往来进行管理，完全采取放任态度。所以并未对船员进行管理。在宋元时代，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日本的船员们前往外国时需要自己解决相关问题。

关于在中国国内的移动，贸易船的船员们通常只在港口附近活动，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遣唐使或遣明使的主体队伍会在中国国内移动，所以对于登陆之后前往何处有必要进行把握，而负责运送他们的船员则只需在港口停留，所以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在前现代，在中国国内移动的日本人，原则上除遣唐使或遣明使以外，只有僧人。正如我在这次报告中提到的，需要在中国国内移动的僧侣们，为了获得在中国国内移动的批准，需要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但在中世时期，日本的国家并不发行这种文件，所以僧侣们只能自己擅自伪造，这一点就是我才所提及的。

之后到了17世纪，开始了朱印船贸易，江户幕府对前往东南亚的商人发行许可。只有获取了许可的人才能前往海外。但这个许可并不需要向目的地国家出示。这只是幕府发放的证明允许其出国的许可证而已，并不具备出示给对方国家作证明使用的功能。当时来日本的中国商人也是一样。宋朝时期，宋朝商人拿着在中国发行的出航许可证来日本，而这个证明也并不是为了向日本出示，而只是为了出国才开具的。

总的来说，在外国人的出入境及国内移动方面，国家间相互确认人员身份的情形，我认为只是针对遣唐使或遣明使等的国家使节。日本与朝鲜之间曾立过各种细节规定，在此我就先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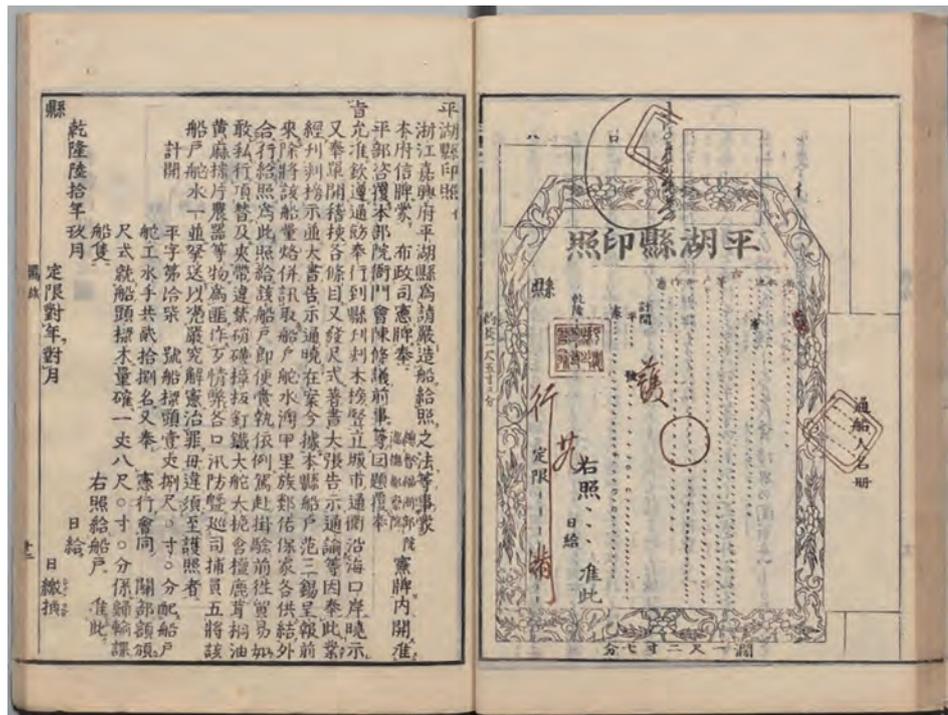
彭浩

谢谢榎本老师，不好意思。可能榎本老师知道的非常多，还有很多要跟我们共享的东西，不好意思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好多老师还没有进行讨论。

我们这个环节既然进行到了中世，那关于明清时代，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跟我的研究有点关系，我是做近世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研究的。更早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多通行证，明清时期更少不了这些。而且好多老师已经知道中国明朝时期有严格的海禁，到了明朝后期开始有一定的松动、缓和，当时又开始允许商人到东南亚去贸易。当时在中国福建叫漳州的一个地方，商人可以从漳州到东南亚去贸易。当时发行给商人的通行证叫“文引”，也是一种渡航证明书，如果没有文引的话，就不允许去国外贸易，这可能是在国内当时，张佳老师讲到的路引的延长线上出现的一个海航通行证。因为海禁之前其实也有好多通行证，但海禁时期，不允许商人出海，所以不需要通行证。海禁缓和以后，又开始发行文引作为通行证。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明朝后期保留下来的文引。

但到清朝时期，这个制度就更加复杂，比方说我做的这个研究里面，清朝商人到日本来做贸易，清朝政府会给他们发行各种各样的证明书。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右上角有这个“平湖县印照”（图1）。在造完船以后，首先要登录船主的名字，还有雇佣的船员的名字，这里面有“通船人名册”。在海关他们也要

图1：  
“平湖县印照”抄写（中川  
忠英编《清俗纪闻》，国立  
公文书馆藏）



申请证明书，以及商人的特许证明书，要到日本进行贸易需要特许证明书。中日贸易的一个很大的目的，清朝政府支持这个贸易的目的就是，从日本进口铜来到中国打造铜钱，需要一种特许的证明书。这种证明书特别允许携带一般的出海不允许携带的商品，比方说丝绸等。这些船要到日本的话，日本政府又会发行一种叫“信牌”的证明书。信牌其实是中国国内的一种公文书的形式，日本为了控制中国船的贸易，特别是走私贸易，向中国商人发行了这种叫信牌的东西，你看到后面有割印，有备份，这样的话可以确认真假。其他老师也提到了，因为当时可能有一些假冒的文书。

当然除了中日贸易以外，广州贸易方面，有很多西洋商人被允许到澳门去住，但是不允许在广州长期居住，就只是在一段允许贸易的时节里面到广州去，需要一种通行证。我们看到左边这个是从澳门到广州的许可证（图片从略），西洋船来到中国做贸易要交税，右边就是交完税的一个证明书（图片从略）。如果这个船到了中国其他地方，海关需要他们再次交税的话，他们可以提交这个证明书，告诉当地的海关人员已经交过税了。

当时清朝有各种各样的公文书出现。现在保留在中国的资料非常非常少，刚才我介绍的日本资料，大家可以看到这不是原版，这是一个抄写，这是所谓的海难船、漂流船，到了日本之后，当地的人，儒者，感觉比较有意思吧，把它给抄写下来。这个资料当时在日本发行，现在好多图书馆都有收藏，在《清俗纪闻》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像这两类的证明书现在最近发现的越来越多，我主要使用的这两个是收藏在葡萄牙的 Tombo 塔公文书馆的公文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他们文书馆在线阅读<sup>1</sup>。

第二个环节可能我们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最后我想提几个跟第二个环节有关

1 Tombo塔国立公文书馆 (Arquivo Nacional Torre do Tombo)  
Arqu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 - DigitArq (arquivos.pt)  
<<https://digitarq.arquivos.pt/>>

系的还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第一,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提,我觉得比较遗憾,这涉及到性别史、女性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国史对话中很少有这个话题,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在马尼拉的那次会议里面,秦方老师作为女性史的专家,提到了女性的问题。其实跟人的移动也有很大的关系。据我所知,比方说我做的明清时代,我们刚才讲到的广州贸易,到广州来贸易的(西洋)商人里面,不允许携带女士来到广州。可以在澳门居住,但是不允许来到广州。同时,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长崎贸易也有同样的规定。另外,关于中国的话我没有自信,因为还没有考察过,刚才张佳老师提到在国内的话也需要有路引。我们大家知道在日本的话,中世相对比较自由,但是到了近世以后,我们知道“往来手形”在近世是非常有名的通行证,没有这种通行证的话出行比较困难。而且对于女性的话,又特别加了很多其他的要求,除了要求往来手形以外,还需要再去申请其他通行证才允许你通行。所以我觉得女性的话题,特别是秦方老师作为女性史的专家,在后半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秦方老师再补充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最后,我想加入这个板块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疫病。刘杰老师的论点整理里面也出现了,因为上次我们谈了好多传染病的问题。这个传染病的问题非常大地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移动,我们现在正好有市川老师这位专家,也参加进来,所以我想下面部分还能请市川老师来发表一些意见。我因为自己对通行证比较感兴趣,所以自己也查了一些资料,我查过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在黑死病蔓延的时候,当时也开始限制人的移动,开始提出了最初的检疫政策,隔离。但只是隔离不行,这个问题在蔓延,像现在一样,所以说后来就有了跟现代人一样的想法。现在是 vaccine passport,打了预防针的护照,而在当时已经有了 health pass,健康证明书出现了。这是意大利 1630 年热那亚发行的一个 health pass (图 2),由意大利普拉托的一个商人携带,这里面还写了他的出生地、身体的特征还有年龄的相关信息。这个商人携带的另外一张通行证(图 3),这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博洛尼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获得了卫生局的通行证。所以说遇到传染病的时候隔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手段,但只是隔离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接下来可能还想如何在尽量限制传染病扩大的情况下,怎么让大家有序地进行移动。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在后半部分请市川老师做补充。我们前半部分的时间已经到了,已经到两点四十六分,我们前半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到两点四十五分,下面我们进行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郑老师,到日本时间两点五十分正式开始可以吗?我们现在结束,请大家稍作休息,然后重新开始,谢谢。

图2：  
热那亚的 health pass



图3：  
博洛尼亚的 health pass



## 第4场

## 自由讨论3

主持人：郑淳一（高丽大学）

成员（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市川智生（冲绳国际大学）、大川真（中央大学）、佐藤雄基（立教大学）、平山升（神奈川大学）、浅野丰美（早稻田大学）、沈哲基（延世大学）、南基玄（韩国独立纪念馆）、金因泰（全南大学）、王耀振（天津外国语大学）、孙继强（苏州大学）

总结：宋志勇（南开大学）、三谷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闭幕致辞：赵珖（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以母语发言]



郑淳一

因为已经到了预定的14点50分，所以我们要开始进行最后的第四场了。我是担任第四场主持人的韩国高丽大学历史教育系的郑淳一。在第三场时，主持人彭浩老师可以说是进行了小型演讲，介绍了很多详细且有趣的内容。所以在第四场时，比起我的发言，我更想引导今天参与讨论的老师们积极发言。

在第三场时，彭浩老师将相当多的课题交到了第四场，比如性别、女性史、传染病、健康护照、健康证明书等。但这些课题要在第四场全部进行讨论是很难的，因此，我想以之前讨论到的问题意识为基础，让未发言或者发言较短的老师们优先发言，以此方式进行本场讨论。

刚才在聊天栏看到了大川真老师和佐藤雄基老师事先上传的资料，平山升老师上传的内容也没能在发言中100%全部提及。很抱歉由主持人指定顺序，但请按照聊天栏上的顺序，按大川真老师、佐藤雄基老师的顺序进行发言。之后如果有想要发言的老师，请先使用举手功能，我会结合实时顺序进行合理分配。请接下来发言的老师们将时间控制在2-5分钟，不要一次全部讲完，因为我们还要进行对话。那么就拜托大川真老师和佐藤雄基老师了。

大川

我是日本中央大学的大川真。关于本次会议的主题“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我想以我喜欢的一部电影为题材进行评论。我事先说明一下，我的专业是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不是电影史研究。

我说的这部电影是1955年上映的《浮云》，由成濑巳喜男导演根据林芙美子的原作改编。成濑巳喜男的作品我全都很喜欢，而这部作品中高峰秀子的演技深深折服了我。关于《浮云》前半部分的剧情，主人公雪子是农林省的打字员，她为追求新生活而于1943年前往“法属印度支那（包含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在内的地区）”，在那里遇到农林省的技术官员富冈，并与其陷入不伦之恋。在当时，“法属印度支那”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移居目的地。在电影中，西贡和金边被称作“绿洲”。其时代背景是，在日本本国因失业或低收入等问题生活难以为继的日本人，契合着当时的帝国主义扩张思想，为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向海外移居。但是，在进驻海外的民间日本人那里，其实基本上看不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类意识的，他们持续呈现出来的是想随心所欲地享用配有前菜和主菜的套餐、冰啤酒、红酒和咖啡的那种欲望。但正是这种想要追求更好的衣食住条件的朴素愿望，虽然没有主观意图，却成为了帝国主义海外侵略的基础，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这也关涉上午曾讨论过的明确国家目的与个人动机之间关系论的问题。

此外，本次未能探讨的性别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浮云》中，沉默寡言的富冈一边想着在本国等着他的妻子邦子，一边却与雪子发生关系，甚至还与当地的女佣发生关系并致其怀孕。但女佣一句怨恨的话都没有说，只是默默回到了乡下。此处只是将帝国主义的问题简略地表现了出来。来自帝国的男人们将妻子儿女留在本国，将殖民地、占领地本地的女性变为情人并遗留下混血子女的事例多有发生，这也不仅限于日本，而这也体现出帝国与其殖民地、占领地之间显著的非对称性（asymmetry）。我们有必要将与性相关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非对称性（asymmetry）问题视为同帝国与其殖民地、占领地之间的非对称性相似的几何学问题（geometrical problems）来思考。以上就是我的发言。

郑淳一

好的，感谢大川真老师的评论。那么，接下来就请佐藤雄基老师发言。佐藤雄基老师，拜托您了。

佐藤

我是日本立教大学的佐藤雄基。今天能参与讨论，真的非常感谢，我深受启发。关于评论，我想谈三点。

首先第一点，在考虑人的移动时，我认为在现代劳动力转移是非常重要的点，但在前现代的劳动力转移存在采取奴隶交易这种形态的情况。关于近现代的劳动转移刚才也提及了“中动态”的问题，讨论到了是真的自发性，还是说其实并无法从自发与强制中二选一，而在现代的劳动力转移中，也存在大量被认为实质上是人身买卖而被问题化的案例。

回到前近代，在日本丰臣秀吉颁布的伴天连追放令（1587年）中，秀吉说日本是神之国，并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们把日本人当做奴隶带去海外的问题。这里将奴隶视作问题，并非出自人权意识，而是意识到国家的体面问题。把谁当做奴隶，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当做奴隶，以及如何救济、解放奴隶身份的人，我认为这些问题与当时的民族意识以及宗教问题（包括是否为异教徒等的区分）密切相关。

讨论中也谈到了人权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这个论点，我认为在思考前现代（以及现代）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时，围绕奴隶劳动“我们自己”与“我们之外”

的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也是与现代相关联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如何思考奴隶问题进行讨论。

接下来是第二点。这次会议中，讨论的多是日裔移民和华裔移民等在移居地保持了自身身份认同的情况。但在人类史中人的移居是一直存在的，我认为被移居地社会同化，或者在移居地形成新的身份认同的情况也多有发生（这可能与平山老师所指出的“国史”中对过去移居的“忘却”问题有关）。

在这次的会议中，应该还未提及在移居地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情况，但在各个移居地都有与其他族裔的人结婚并生下混血子女的情况。我反倒是觉得，不发生同化、融合，一直保持单一族裔的身份认同才是不寻常（倒不如说是少见）的。是迫于移居地的社会结构（对移居者的歧视等）而不得已为之，还是说持续维持日裔移民或华裔移民的身份认同会有何种主体性的益处，我希望可以有人告诉我这个问题是如何被讨论的。

第三点是宗教问题。在前现代，除了奴隶以外，由宗教动机带来的移动在史料中也多有记载（巡礼记等）。在思考支持人们的巡礼以及在移居地定居方面信徒关系网与宗教所起的作用时，往往被关注的是基督教或佛教这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宗教。相较于全球性宗教的动向，我对神道教等本土宗教在人们的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文化融合中所起的作用更感兴趣。

日本的前现代时期，发生了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佛教与神道教进行“习合”（融合）的“神佛习合”的历史现象。我认为人们的宗教意识是多重的，普遍性宗教与本土宗教并非一定会产生矛盾或对立。通过以更开阔的视角来审视信仰问题，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人们移动的样态，以及身份认同如何被保持或者身份认同的变迁过程。

还有在第二场中讨论到的护照问题。我也很感兴趣，等有机会我再发言。以上就是我的评论。

郑淳一

好的，感谢佐藤老师。到时候还请佐藤雄基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护照及通行证的问题。刚才佐藤雄基老师谈到的三点中，最后一点是关于宗教的。之前也有过关于宗教问题的评论，我想把话筒交给平山升老师，请您提出进一步的评论。

平山

刚才我就宗教问题做了评论，因为我还准备了另外一个评论要点，请允许我读一下。

盐出老师提出了“国史（national history）应该如何思考人的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准备的另一个评论点与此相关。

我也认为思考“国史”中被遗忘的“移居与移动”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与赵阮老师和张佳老师所介绍的蒙古帝国以及明朝的强制移动相同，其实在“日本”，向前追溯的话，也存在中央政权强制地方居民移居、移动的历史。举例来说，在东京都八王子市发掘大约 1200 年前的遗迹时，在那里发现的土器的特征与距离东京甚远的东北地区的土器相同。当时的中央政府使用武力征服了住在东北的“虾夷人”，强制他们移居各处，这些土器就被认为是出自这些移居者之手。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被彻底遗忘了，但在这个地方直到现在都还保留有与东北地区的方言完全一样的一些词汇，这也令从东北过来的人很是惊讶。

在幸存者尚存的近现代史中,也有一段被完全遗忘的“移居”历史。在战前日本,有一批人作为满蒙开拓民前去了大陆(中国)。日本战败后,他们撤回到本国,通过政府的紧急开拓事业得到了一些贫瘠的土地,再次尝试土地开垦,但大多进展并不顺利。甚至有的人因核电站建设的推进土地被政府收购,从而再次失去土地。像这样的地方明明在日本也是存在的,却被现代日本社会所遗忘,也不会学校的课堂上提及。

在此基础上,我想谈以下三点。

第一,在现在认知的“同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只要我们将视野扩展到前现代追溯历史的话,能发现很多有关“移居与移动”的历史。

第二,我认为有必要思考“对移动的历史的忘却”问题。这不仅限于专家学者的“有过移动”的相关历史叙述,还应该思考“明明有过移动的历史,但为何会被遗忘?”这种与历史叙事方式相关的问题。

第三,上述两点的认识不应仅停留在研究者之间,应该让普通大众也对此有所思考,这样可以促使他们从当事人的立场去思考,比如引发“该不会我的祖先也曾……”这样的想象。

要对第三点进行补充的话,正如韩成敏老师谈到的,帝国日本的强制动员造成了日韩两国之间深刻严重的冲突,但对此缺少“如果那是自己,或者自己重要的家人呢?”这样的想象力,且这样的情况还不少见。因此,我想说,通过了解“自己国家”历史中也曾经有过很多被强制进行“不想要的移动”的人群,以及在整个社会共享“该不会自己的祖先也曾其中遭受苦难”这样的想象力,会不会有助于解决冲突呢?

以上就是我事先准备的另一个评论点。但关于宗教,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关于佛教,我最近意识到一个现象,每当日本陷入对外危机时,随着与外国对立状况的深化,佛教就会受到攻击。这个状况在幕末(江户时代末期)和昭和时代都发生过。平时,佛教通常被看做是完全本土化了的日本宗教,但与外国的对立深化、民族情感被激发的时候,“话说佛教不也是从印度和中国传来的外国宗教吗?”这样的论调就如同突然想起来一样,涌现出来。佛教是在整个亚洲广为流传的宗教,但在特殊时期却会被卷入国家对立之中。我觉得对此也有必要进行一些思考。以上就是我的评论。

郑淳一

好的,感谢平山老师。我认为您在最后讲到的宗教问题与佐藤雄基老师在前面发言时讲到的第三个问题意识是相关联的,而第二个评论中的强制动员问题,也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动员的问题,则是与佐藤雄基老师在刚才讲到的第一个问题中的奴隶贸易和并不是自愿移动的人们的问题相关联的,还与刚才指定讨论者韩成敏老师谈到的所谓“强制动员”等各种问题相关联。对此,就拿前近代的情况来说,可以联想到金圀泰老师所研究的壬辰倭乱、壬辰战争时期,从朝鲜被带到日本的被俘人员问题。稍后我们来听听金圀泰老师的评论。南基玄老师说准备了评论,那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评论。

南基玄

大家好,我是南基玄,我将使用韩语进行发言。在听了盐出浩之老师和其他老师们的发言后,我意识到人们的移动与各种规范相关联,尤其是盐出浩之老师提到

的夏威夷的日裔居民和华裔居民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想到了一些事情，这和刘杰老师在前一场时所谈到的内容有关。我认为应该对移民在移居之后，其与当地的关系、作用、对立、矛盾等多个方面重叠在一起的情况进行思考。例如，对于在韩国成为殖民地前后韩国人移民到日本的情况，韩成敏老师进行了详细说明。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就是日本人会进入殖民地朝鲜，这些大多都是在朝鲜总督府或日本政府的政策下实施的。多数人都是以建设农场，或者是被任命为总督府官员的形式来到朝鲜的。

最初在韩国以日本人的身份生活的这些人，在与韩国人接触后所产生的一些现象值得关注。虽然国籍和民族是日本，但居住在殖民地朝鲜的这些人却表现出与日本政策相反的利害关系。特别是这种分离情况，我认为在移民的下一代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能看到居住在殖民地朝鲜的日裔二代对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与前一代截然不同的现象。在这种以国家、民族的身份居住的过程中，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有哪些想法，尤其是那些移民的子孙和二代们，他们到底算不算移民，对于他们而言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比较疑惑的部分。

郑淳一

好的，感谢南基玄老师。您在评论最后所提到的部分，我认为是在与日朝鲜人问题，或者日本国内的日裔巴西人的问题相关联的。我想动用一下主持人的权限，请教一下中国的国史中是如何处理这样的移动问题的，因为刚好提到了与近现代有关的话题，请问王耀振老师或孙继强老师是否在席呢？首先，王老师，能听到声音吗？麻烦请对目前的讨论发表一下评论。

王耀振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王耀振。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移民，以及人的移动。这一主题与我前段时间所做的研究有一定的关联，这也是我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原因所在。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内容，现在做的另外一个课题是关于近代日本商业会议所对华经济调查。今天，我主要想谈一下我目前所做的这两个课题与近代中日之间的人员交流、人的移动的相关性。

首先谈一下近代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对华经济调查。为什么会有这个调查呢，我想主要还是由于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大量人员进入中国，从事通商和贸易。有这样一个人员流动的背景才产生了近代日本商业会议所对华经济调查的需求。今天这个会议给了我一个关于目前所从事研究的启发，也就是从人的移动、人员交流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商业会议所在华从事的经济调查活动。那么，就近代以来日本对华移民来讲，刚才有学者提到了满洲开拓民，事实上在那之前，即甲午战争之后已经有日本的移民，或者日侨进入中国。我这里有一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当中用到的一个数据。甲午战后 1898 年天津的日侨，也可以叫日本居留民，共有 52 个人。到 1926 年增长至 5664 个人，再到 1930 年增长至 6642 人，这是天津的情况。那么，再到上海的话呢，1935 年的在沪日本居留民是 27299 人。可以说从人数来讲，在华日本侨民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人的移动，有了日本侨民的大量进入中国才产生了日本商业会议所对华调查活动的实际需求。这便是今天的会议主题带给我的一个启发。

其次，有专家在上午的主旨演讲当中提到了抵制日货这个话题。日货俨然成为近代中日之间人员交流中的一个关键词，可以说在近代中日之间的交往当中，日货

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媒介。人的移动脱离不开国境、种族、主权等因素的制约。由此我想到，日货作为一种商品已经具备了某种属性，它是中日民间关系的表征，或是民间抗争即中国民众对日抗争的一个对象物。日货已经成为日侨身份的一个标签化的东西，或者说日货已经成为日本国家符号的一种延伸，也是日侨这一移民群体的一个符号化的存在。由此，我便想到在考虑抵制日货这一问题时，可以从日货与日侨这一移民群体关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是今天的会议主题带给我的另一个启发。

最后，针对近代日侨在华从事的活动，目前学界探讨的主要是日侨如何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探讨的。就是说，日侨的进入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近代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日侨在华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增强了中国民间参与经济交流的意识。比如说，中国商人团体在1926年曾经组团赴日参观，这就是在日侨及日货大量进入中国的刺激下才有的一个活动。总之，中国民间参与对外经济交流的意识得到提高这一点是近代日侨在华活动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意义。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

郑淳一 好的，感谢王老师。我认为您利用数据介绍了日本侨民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那么紧接着下一位，孙继强老师能否听见我的声音？好的，那就拜托您了。

孙继强 各位老师好。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人的移动，而现在在因为疫情的原因而使我们的移动变得困难的背景下来做这样一个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上午各位老师的发言，我学到了很多的内容，尤其是刚才很多老师提到了东北移民的问题。刚才有老师提到，从自发性和强制性的角度来讲，东北移民是强制性的。但是，我认为东北移民不能简单地把它定性为强制性的。当然它从整体上来讲是带有强制性的，但是同时它也带有一定的自发性。我们知道1936年日本召开东北移民会议的时候，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的移住计划。这个计划的推行，作为一个国策来讲，并不是完全地强制国民去参加的，它是通过一种动员的形式，比如说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呼吁，或者通过媒体的宣传，通过媒体的动员来做的，当然这些媒体的动员是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但是，在这其中，起最主要作用的还是这些移民本身自己本人的这种主观的决策，以及后面的这些利益的驱动等等。所以我觉得满洲移民既有它的强制性，也有它的自发性，而且满洲移民它本身就是满洲移民政策或者是日本在东北推行殖民政策的参与者，执行者。无论他主观上是否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他本身在参与到这个移民的活动过程中，他就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植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满洲移民是同日本的满洲殖民政策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要从主动性和被动性两个方面来定义满洲移民可能会更科学一点。这是我的感受，谢谢。

郑淳一 好的，感谢孙继强老师。我认为您以满洲移民的问题评论了之前持续讨论的移动的自发性、非自发性问题。接下来想有请之前拜托过的金罔泰老师，请您发表评论。

金罔泰 我是韩国全南大学的金罔泰，我将使用韩语进行发言。我主要研究的是壬辰倭乱。

战争是很多人进行移动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在战争结束后，将被抓走的人送

回他们国家的尝试。这些人或是战俘，又或是残留人员。有进行这种尝试的国家，也有未曾进行这种尝试的国家。另一方面，归来的人们会被问到“你是否是爱国者？”，以此来验证是否具备很强的国家意识。这不禁让人思考该如何评价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种事情不仅在现代，在前近代也有过。正如郑淳一老师刚才所说，壬辰倭乱和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很多朝鲜人被带到日本，被带过去的朝鲜人为陶瓷、儒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在韩国教科书中非常有名。不仅如此，还有把被抓去的人带回朝鲜的工作。朝鲜与江户幕府交涉遣返了很多人，但这并不是依据近代国家主义的行为。这是在“百姓和国王的子女都一样”的儒教理念下所进行的，在韩国历史上非常重视这一点。但朝鲜对这些被带回朝鲜半岛的人，好像并没有太在意他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对此也有人持批判态度。我举的是前近代的事例，想请教各位在各自国家历史中是否存在战争后将本国人民带回的尝试，如果存在，是在哪些方面进行的尝试，望各位不吝赐教。

郑淳一

好的，感谢金囿泰老师。虽然诸位老师都在提问题，但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我们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吧？据我所知，稍后会有宋志勇老师和三谷博老师的总结评论，届时还请两位老师发表一下评论。在此之前请市川老师进行发言。

市川

我是冲绳国际大学的市川智生。在上次的会议，我就传染病的历史问题做了报告。我想现在大家都深刻地体会到人的移动与传染病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我想谈两点想法。

第一点与刚才平山老师提到的排斥佛教问题有关。我本身研究的是日本近代史，但在大学课上也会教考古学以及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我也会向学生介绍古代日本的古老文献中与疾病相关的记载，其中经常提及的是，佛教传到日本与天花在日本流行是相关的叙述。这当然不是因为宗教在日本的普及造成了传染病的流行，而是当时可能恰好出现了大量的人口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和技术的移动。在《日本书纪》中钦明天皇13年（公元552年）的相关记载说天花在日本的流行是因为引进了佛教，所以把寺庙和佛像都烧光了。但那之后想法却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认为可以利用佛教的力量去镇住天花。这点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平山老师，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对吧？

然后第二点，我想从我的专业谈一谈盐出老师提及的“人的移动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通过切身的体验感知到移动会造成传染病扩散的事实。特别是现在我身在冲绳，完全就是一个小岛的社会，这样的环境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移动与传染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冲绳，以前有过战争和疟疾的问题，而现在则针对观光产业与新冠对策进行热议。如此一来，针对传染病的对策其实就是与如何限制人的移动关联在了一起。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报告的是海港检疫的相关问题，而其中的一个方面正是国家如何限制人的移动的问题。看到现在的新冠问题，我深刻感受到其中的历史性，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相同的事情。

我举一个事例，2020年1月在新冠病毒的扩散还仅限在中国武汉的阶段，日

本政府派飞机去接在武汉的日本人回国。我当时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是有点惊讶的。因为我想不出来，在历史上还有哪次传染病爆发的时候出现过去接本国国民回国的情况。在我看来，比起传染病预防，这样的行动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保护本国公民的目的。这更接近于一种灾害时的紧急救援的形式。我认为这个事例让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对于国家对人的移动的限制的看法与价值观，现在与几十年前、或者我所调查的明治时期的日本相比，已经发生了改变。

对于这个问题，不只是日本，相信在座各位的国家也各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认为也会有采取跟日本一样的想法和做法的国家。对于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这个背景与移动的问题，我认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郑淳一 好的，感谢市川老师。在我尽力之下，大概还剩 13 分钟。刚才佐藤雄基老师就通行证的话题要进行发言，请问能否在 1-2 分钟内完成？我先给您发言权。

佐藤 刚才榎本老师在评论中介绍了中世日本在国内发行过关所的通行免除证的事例，虽称之为“国内”，但并非是发行免除证的政权管理着关所，更像是一种“权威”的通用。中世的天皇面向周游的匠人等发行过通行证，但我认为并不能因此认定中世的天皇实现了对国内的统治。网野善彦老师也曾介绍过，日本中世的匠人中曾有人拿着“异朝证文”，即外国政权的文书来主张其移动的自由。此外，泰国的山地居民中也曾有人持有声称南宋皇帝保证其在山地间自由移动（可能此并非历史事实）的文书（“评皇券牒”）。中世日本与泰国的山区都是“国家”统治不太坚固的地区（最近作为“Zomia”被关注），所以反倒是国家管理坚固的地区、时代是不普遍的。这么一想的话，那在思考前现代的移动的存在方式时，或许还有必要反思超越“国家”框架的宗教或利用其他权威来保障移动的机制的存在方式。

郑淳一 好的，感谢佐藤老师。刚才我们有过讨论，几位老师也对性别问题发表了看法。中方老师们对性别和人的移动有何看法，秦方老师可否用 2 分钟时间简短地评论一下？谢谢。

秦方 好的，我就不开视频了，因为这边信号不是太好。我觉得性别在近代的移动之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全球殖民的过程之中，比如说从英国殖民到印度，当英国的女性还没有到来之前，其实更多的是英国的男性和当地的女性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当地女性扮演的是一个替补性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一类。另外一类是说，后来慢慢随着白人的女性可以开始离开她们自己的国家到各个地方加入这些白人男性，我觉得她们到达被殖民或被占领的这个地方，她其实同样跟当地的女性以及当地的男性之间也会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性别引入到近代关于国家，关于移民的角度里面来，并且要根据一些非常具体的在地的情况，来对性别进行分析。就这样简单说一下，谢谢。

郑淳一 好的，感谢秦方老师。现在还剩下 10 分钟左右，关于已经讨论的内容，各位老师能否用 30 秒到 1 分钟的时间进行自由发言呢？大川老师等了很久，我先给您

发言权，而后是盐出老师，那就拜托了。

大川 宗教问题也非常重要，刚才有人提到了佛教问题。但另一方面，比如说关于对华“二十一条”，佛教界为保障移居海外的日本人的宗教生活而积极推动政府缔结此条约。因此，关于宗教与政治以及居住者的安心状态之间的关系论，我认为必须要对在当地的生活进行非常立体综合的考量。以上就是我的发言。

郑淳一 好的，感谢大川老师。接下来就拜托盐出老师了。

盐出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韩老师，和其他研究韩国史、朝鲜史的老师请教。从近世到 18 世纪前半叶开始，有大批人从朝鲜半岛移居到中国，对此现象，朝鲜王权的应对态度为何？关于国家边境管理，清韩国境是如何被管理的，以及中方对此是如何应对的？关于这一点，想了解一下近年朝鲜的自由的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

郑淳一 韩成敏老师，接下来该您评论了。

韩成敏 我聚焦的并不是自发性或非自发性的问题，而是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哪些人进行了移民的问题。无论是从接受殖民统治的立场上移民，还是从殖民统治的立场上移民，这些移民大部分都是弱者。造成大规模迁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处在国家利益最前沿的地区，其大部分是真的因为温饱问题而离开故土。问题是弱者之间的矛盾在那里非常严重。从 1920 年代后期开始，在韩国和日本掀起了“满洲移民热潮”。当时满洲被描述成是一个既有梦想，又有浪漫的地区，但真正到了之后却发现并非如此。人们为了生存而彼此斗争，牺牲的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用相对优势来试图支配，对此在抛开民族和国家的层面进行思考时，矛盾是否会有解决的余地是我想提出的问题。

其次，关于间岛问题的评论，我认为金因泰老师可能比我更合适。当时的间岛是清朝的“封禁地区”，因为这里是清朝的发祥地。当时朝鲜大饥荒旷日持久，但鸭绿江、图们江对岸则是相对富裕的地方。很多人搬过去之后，便开始耕种土地。此前一直漠不关心的大韩帝国政府突然开始关心起了这些人。其理由是为了公开宣称帝国，所谓的帝国指的是统一多个国家，而他们缺少这样的名义。所以将遥远的新罗时代的韩国统一搬出来，将其称为“三韩一统的大韩帝国”。为了具备这样的帝国面貌，他们曾试图开拓间岛，将间岛领土化。

另外，其根据之一在韩国社会偶尔会成为问题。在位于长白山的区分中国和韩国领土的“定界碑”中所说的“图们江”的位置目前还没有定论，因此似乎与中国正在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间岛问题。在过去，由于进行户牌检查，普通人基本上是无法脱离自己的地区社会的。这些问题，我认为金因泰老师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郑淳一 好的，感谢韩成敏老师。好的，盐出老师。

盐出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在国史中是如何处理人的移动的问题，刘杰老师已经

就中国的情况做了说明，那韩国的情况如何？任何一位老师都可以回答。

■ 郑淳一 金罔泰老师在历史教育系工作，韩国历史教科书（本国史教科书）中是如何描写人们的国际移动和人们是如何移动的呢？关于人的国际移动在国史中是否有所体现，请您在能力范围内回答一下。

■ 金罔泰 对此我并没有完全掌握，古代史我想郑淳一老师应该比我更加了解。事实上，与其说是关注移动的人，不如说是在近世、中世以后的国史立场上，韩国人在历史中对其他国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化等问题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 郑淳一 是的，我再补充一点的话，韩国的国史教科书中强调，对于从海外来到韩国的移民，韩国是积极地接纳了这些人和他们的文化的。另外，对于海外的韩国人，他们在海外的生活中坚守着自己的特色，并且守护着韩国文化。这些部分被着重强调，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

我想现在其他老师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但不知不觉间预定的自由讨论时间已经结束。那么按照宋志勇老师、三谷老师的顺序，进行10分钟左右的总结评论，拜托了。

## 总结

宋志勇

今天第六次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主题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上次会议相比，主题更加突出，更加集中，我想谈几点感受。

第一，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同时又非常复杂。人口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的关系，既发生在各国国内的人口移动，也发生在国际间的人口移动。既有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的会议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移动。制约我们移动的因素是什么，探讨这样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今天各位学者从古代到现代，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里面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具体的史实的考证。谈到了近世到近代跨越国境的人口移动与锁国——开国的国家政策的关系，谈到了人口移动与人权的问题，谈到了户籍制度、古代的通行证以及近代的护照等与人口移动的关系，以及自发移民与强制移民的关系，所谓强制移民主要以殖民地的移民为代表，以及人与国家、国民、帝国、近代化等要素与人口移动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跨越了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探讨，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点，从大家的报告和讨论中可以看到，人口的移动在东亚三国都有发生，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各有自己的特征。从大家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权力（政治）、经济这三点无疑是人口移动的主要原因，当然文化、宗教因素也很重要。这些重要的因素不仅表现在三国的国内，也表现在三国相互之间。既发生于古代，也发生在近代乃至今天。大家介绍了很多这样的事例。

第三点，对于人口移动的后果及其影响，有的先生谈到了，但谈得还不太够。人口移动的后果及其影响，一方面是移民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可能涉及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移民对其故乡、祖国的影响。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华侨对 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的制定以及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政治上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开放，经济上带来了对国内的大量投资，以及教育方面促成了大量留学生的出国等等。这些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没有华侨对中国国内这种影响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有的老师也谈到了，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是移民与祖国的关系，他们的祖国意识，移民与原籍的关系及其原籍意识。盐出先生也提到了日本在夏威夷以原籍冲绳为单位进行的移民活动，以及在海外的这些活动对冲绳所产生的影响。另外大久保健晴教授也提到了中日韩三国对于南洋有什么共同的想法，对于南洋移民观的比较研究也很有意义。

第四点，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一个事例。关于中国的移民情况，复旦大学的张佳教授已经介绍了很多。就中国移民的事例而言，以中国东南地区的中国人向南洋（东南亚）移民和山东向东北移民最为典型。山东向东北的人口移动对东北的开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解决了山东的人口过剩问题。山东移民在中国叫“闯关东”，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其规模据说从清代到中华民国时期大概超过 2000 万人到了东北。虽然日本战时对中国东北的“国策移民”影响很大，但其规模很有限，

而且只是战时那段时间。中国内地对东北移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刚才也提到从清代到民国有2000多万人。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移民一直在持续，比如战后中国的政策移民。比较有影响的有朝鲜战争之后，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志愿军大量留在东北，进行东北的开发。还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大量的知识青年通过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到东北进行开发。这些政治移民对于东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今天有一些新的现象，过去都是内地、山东这些地方往东北移民，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但东北经济出现落后的情况，导致东北人口大量向内地流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现象，这些人口之中，大量山东移民，过去是从山东到东北，现在又大量从东北回到山东，因为现在山东的经济形势和生活水平比东北要好得多，出现了“返流”现象。这对我们研究人口移动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事例，有助于我们今后的研究。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谈一点自己的感受，谢谢大家。

郑淳一

好的，感谢宋志勇老师。接下来有请三谷老师进行总结评论。

三谷

大家辛苦了。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充实的报告和讨论，说实话我已经累坏了。不过我认为很有成果。

当下国际环境非常紧张，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冠疫情，也因东亚三国正在相互敌视。仅看国内的情况，全世界可能都认为三国人民现在相互为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盛大召开今天这样三国都参加的学术会议，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果。这当然离不开我们前几次会议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我也期待今后我们的会议能够继续取得更好的发展。

今天涉及了好几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最初提到的是“移动的原因”问题。对此我受益良多，很是佩服各位。移动的原因中，有强制的，也有自发的。也有老师指出了存在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原因等。从日本史研究者的立场出发，我在思考日本有没有强制移民时，却完全想不出案例。江户时代初期，大名被迫移动，但那类似于公司搬迁，住在那里的居民并没有移动。因为我是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所以想不出历史上有过什么强制移动的案例。当然，在日本统治时代，有人从朝鲜半岛被强制移动到日本，不过这并不是发生在日本人之间的。但今天在会议最后，听到古代虾夷的案例，通过考古学证明了北方人被移居到关东地区，我突然意识到“啊，原来如此”，原来日本也不例外，和外国一样也有过那样的时代。这是我的第一个收获。

其次，会议对通行证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从国境管理的观点看，在今天的会议主题中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行证在很久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对于其发展演变，有好几位老师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在学问上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收获。但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护照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并开始管制全世界人类的呢？我想这应该是从欧洲开始的制度，然后在其半强制性的推行中最终造成全世界的人都受制于它，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既然护照有如此大的强制力，那应该存在一些与它相关的条约才对，我希望对通行证问题



感兴趣的老师们能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以前对这方面稍有涉猎，卡尔·马克思1848年因革命失败被欧洲驱逐时逃去了英国。因为当时没有护照制度，英国竟然接受了这么危险的人物。他光明正大地在大英博物馆积累学问，并写下了好几本巨著。在欧洲也曾有过那样的牧歌式的时代。但东亚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是那样的。我希望各位对此种差异要多加留意。关于东亚，大家都在进行非常优秀的研究，拥有着面向世界发言的自信，但我觉得如果只是限定在东亚的话仍有些可惜。同是地处亚洲，我们不可忽略俄罗斯。比如在19世纪前半叶就有相当多从朝鲜半岛前往俄罗斯的移居者。当然远在那之前，就已经有从中国前往东南亚的移居者，今天会上也有老师谈到了。我觉得视野不要只局限在东亚三国，稍微再扩展一些可能会更好。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些问题只要肯好好研究，就会得到相应的成果，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可以在此基础上出版合作论文集。

然后，作为会议的听众，我注意到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在会上没有被提及。这可能与刘杰老师的发言重合了，我认为有两个问题被忽视了。

第一个是文化杂糅问题。对此比较容易采取负面的观点，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当今有名的GAF A（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和亚马逊(Amazon)）四大公司和微软公司中，有两家的管理者是来自印度的移民。像这样，在经营管理的世界里面，拥有多重文化背景的人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学术界以及体育界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不看出身看实力的时代，移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注定是要融合不同文化的，所以他们也从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我认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每当谈到杂糅，通常马上联想到的是欺凌等负面的话题，当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我认为正反两方面都应该关注到才好。作为今后的课题，我期待各位能对此进行专门研究。

另外一个便是伴随移居而产生的摩擦问题，对此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在会议最后，有几位老师提到了相关问题，我认为提出来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但在当下东亚三国的政治局势下，我感觉各位在这个问题上貌似不太想涉及彼此。最低限度提到了此问题，但没能继续深入探讨。我承认存在实际的困难，但既然是研究课题，或是在面向社会进行阐述时，这都是无法规避的，所以希望各位今后能多多留意。市面上已经出版了不少谈及此问题的书，但今天的会上却给我一种大家想对其淡化处理的印象。

从整体来看，今天的会议还是进行得非常充实的。作为年长者，我深深感受到下个世代研究者们优秀。各位今天报告的选题立意新颖，超出了我们那个世代的人的思维，并且都是基于史料考证的扎扎实实的研究。所以，我认为东亚历史学界的将来是光明的。

像今天这样的会议，最害怕的就是大家各说各话，等会议结束后便想不起来会上都谈论了些什么。但得益于今天的主持人以及会议组织方的各位的努力，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对此，我从心底对会议主持的老师们表示敬意。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努力。

会议如此成功，并且各位也都交到了很好的朋友，所以希望各位今后也要将这种跨越国境的共同研究持续下去，这是我对各位最大的期望。如果能出版合作论文集就更好了，希望各位能积极去促成这件事。这是我们年长者的心愿，拜托各位。

最后，多亏了各位同声传译，会议才能进行得如此顺利，我谨代表大家向你们表示感谢。还要由衷感谢以今西女士和三宅女士为首的渥美财团的各位。以上就是我的感想。

■ 郑淳一

好的，非常感谢三谷老师，给出了名副其实的总结性评论。

等了许久的赵珖老师正在准备闭幕致词，那么最后把话筒交给赵珖老师，请您跟大家说几句话。

## 闭幕致辞

赵珺

大家好,我是赵珺。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以建立“知识共享空间”和“知识平台”,并由此创造和解的智慧提供给东亚为宗旨,于5年前的2016年9月开始举办国史对话。2020年初在菲律宾举办的第四届之后的国史对话是身处于新冠病毒盛行的传染病时代的我们回顾传染病历史的聚会。今年,我们还没有摆脱传染病,并在因传染病我们的移动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探讨了“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克服了当今“移动”不自由的状况,通过新媒体创造了超越壁垒相互交谈的机会。因此,我们通过网络会议的方式,不管身处何地,都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同一时间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对话。特别是在这次第六届大会上,为每一位报告人安排了两名讨论者,从而将讨论变得更加深入。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移动”。土耳其裔英国人学者摩里斯·法尔希(Moris Farhi)在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移动/移居的历史”(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20世纪中叶,法国的年鉴学派研究者们开始正式将移动作为历史主题。而早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曾提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法尔希将其套用的做法实属让人意外。

法尔希将迄今为止的历史叙述分为两种。一是“御用”或“党派式”的历史。这种历史在美化战争、征服与殖民的同时,将被占领者的文化边缘化以及为被认为是低等级之人的死亡呼喊快哉,他主张这是错误的历史。另一个是“真实的历史”(true history),法尔希说,这是面对野蛮的镇压和屈辱,书写人类尊严的无名耶稣的历史。在东亚历史上,无名耶稣、无名佛祖、无名预言者等被形容为因贫穷和压迫而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流亡者、难民、驱逐者、异乡人”,这些人被称之为“移民人”(Homo Migrans),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主人公。

考虑到当今历史学界的潮流,我认为此次第六届国史对话所标榜的共同主题是非常恰当的选择。通过本次报告大家可以发现,东亚地区的“移动”存在于整个时代,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在今天的每一场谈话中,大家报告的文章和讨论中所隐藏的核心内容可以理解为“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移动,通过文化和种族的接触,促成了相互的改变”这一主题。

这在东亚也是一样,东亚地区的移动有时会因为彼此的不同而引发冲突。但是不知不觉间发生融合,重新编织成了由更广、更深的网络组成的共同体。当然,人类的这种移动也会伴随多种植物和动物的移动。举个例子来说,从19世纪末开始进行的朝鲜人的间岛移民使水稻和水稻种植的界线北移。植物的移动也使其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就是由人的移动而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所创建的新的生态网络。

通过今天的对话,我再次确认了并不存在单纯具有单一基因的民族、个人或文化,个别人中已经包含了世界。但是当前世界各地似乎都出现了预示历史性退步的不断深化的矛盾与对立。这样的对立成为人类和平的巨大障碍。我认为需要在每个个体存在,即每个人,以及融入于国家和文化的多样的“你”的基因之间引发共鸣,

才能克服这一对立。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跨越我和非我的界限，在保持个体身份的情况下，能完整地展开以“共同善”为一体的全球知性活动。该知性不会在各自的位置上破坏各自的固有性，而是唤醒良心和感性，以及智慧和伦理，为地球共同体面临的危机，指明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在今天的论坛上见证了这种共鸣和改变的可能性。首先，向确认了这一可能性的今天的报告人和讨论者们致以感谢。

纵观人类的历史，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地理位置的移动。同时，对新冠病毒的快速扩散和移动也起到了作用。此次新冠疫情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不仅是东亚社会，地球上的全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而且，新冠疫情还证实了这个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人类的共同体，而是生态共同体。如果说新冠肺炎来自蝙蝠，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便是一个确认生态共同体意义的事件。

鉴于此，向通过此次论坛展现人类和文化、自然和宇宙的网络的诸位报告人和讨论者表示深深的谢意。今天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人，站在不同的物理坐标上。但是，我们拥有同一个地球共同体的共同善和向往和平的一颗心，并且再次确认了我们永远是一体的。

在下次举办的第七届国史对话论坛上，希望我们能跨越“与新冠病毒共存”（with Corona），在“没有新冠病毒”（without Corona）的情况下，在美丽的地球、更加美丽的台湾，相互享受移动的自由，以健康的面貌再次相见。再次向为国史对话的持续举办做出努力的包括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常务理事今西淳子在内的各位相关人士，以及为准备网络会议而努力的各位表示深深的感谢，非常感谢大家。

## 讲师简介

### ■ 盐出浩之 / SHIODE Hiroyuki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专业为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史。2004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获博士（学术）学位。曾供职于琉球大学法学院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职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担任副教授，现升任教授。

主要著作：《越境者的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等。

### ■ 赵阮 / CHO Won

汉阳大学史学系毕业。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主攻16世纪蒙古研究。后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课程，以“蒙元帝国期达鲁花赤制度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首尔大学历史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课题为“17-20世纪蒙元史研究中清朝知识分子的蒙古帝国认识”。曾任汉阳大学比较历史文化研究所HK研究教授，现任釜山大学副教授（2019年-）。曾从事元帝国时期的统治制度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的相关研究。现在就蒙古在东亚统治的遗产进行研究。

主要著作：《元朝后期的《经世大典》编纂与六典礼制》（《东洋史学研究》141，2017年）、《大元帝国法制及其在高丽的受容状况》（《梨花史学研究》54，2017年）、《在朝鲜的元帝国法律文书》（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出版部，2021年）等。

### ■ 张佳 / ZHANG Jia

山东高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学士（200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硕士（2007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史博士（2011年），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社会文化史。

主要著作：《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发表论文《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衣冠与认同：丽末鲜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明初的汉族元遗民》等十余篇。

### ■ 榎本涉 / ENOMOTO Wataru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修满学分退学。曾任职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担任助手，现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获博士（文学）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中世史。

主要著作：《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 9-14世纪》（吉川弘文馆，2007年）、《僧侣与海商们的东中国海》（讲谈社选书 métier，2010年/讲谈社学术文库，2020年）、《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传记集成 附 江户时代的僧传集积过程研究》（勉诚出版，2013年）。

■ 韩成敏 / HAN Sungmin

1991年东国大学史学科学士。1998年东国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硕士。2016年东国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博士课程毕业。文学博士。现担任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院研究教授。研究领域为韩国近代史、近代日韩关系史、韩国近代外交史。以近代以后走向明确不同道路的韩国与日本作为问题意识，细致从事作为日韩之间历史问题起源的近代日韩关系史的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日本的“韩国合并”过程研究》（京仁文化社，2021）；《日本对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朝鲜特使的应对》（《韩日关系史研究》51，2015）；《日本政府对流亡者金玉均的应对及其朝鲜政策（1884-1890）》（《历史与现实》109，2018）；《1907年体制成立过程中日本的韩国政策与韩国社会的应对》（《日本历史研究》49,2019）等。

■ 秦方 / QIN Fang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和妇女史议题。

主要著作：《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中华书局，2019年）和其他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 大久保健晴 / OKUBO Takeharu

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博士（政治学）。研究领域为东方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思想。主要通过考察18-19世纪日本与荷兰的交流，跨文化多角度思考从初期近代到近代，西方和东亚之间围绕外交、经济、学术、法律等开展的交流史。在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研究科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曾担任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的专任副教授，荷兰·莱顿·亚洲研究国际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2019年开始任现职。

主要著作：《近代日本的政治构想与荷兰》（东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The Quest for Civilization—Encounters with Dutch Jurisprudenc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atistics at the Dawn of Modern Japan—》（translated by David Noble, Brill, 2014）等。

## 第6届国史对话 《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 报告

金因泰 全南大学

第六届国史对话会议再次召开。这是该会议继今年1月之后，时隔7个月再次举行。彼此靠近的友谊不会轻易疏远，但如果经常见面，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则会越来越高，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本次会议上，大家再次见到熟悉的面孔，热情地问候了彼此。

本届会议制定了一个共同主题，由一名报告人提出问题后，以众人共同讨论的方式展开。主题是大家都可以谈论的“人的移动”，这是一个值得学术界和公众激烈讨论的热点话题。

网上会议于北京时间9月11日上午9点启动。为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事务局和翻译人员做出了巨大努力。因此，首先向他们表示感谢。9点整，“对话”在李恩民老师的开幕致辞中拉开帷幕。村和明老师回顾并介绍了即将迎来第六次召开的国史对话的历程与宗旨。考虑到往届因讨论时间不足，每次都会留下遗憾的经验，所以本次会议选择以讨论为重点的方式进行。只不过令人担忧的是，本次实验性的尝试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大家。好在从结果上来看，实验取得了成功。

问题由盐出浩之老师提出，标题为“从人的移动看近代日本：国境·国籍·民族”。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受到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虽然有很多人试图摆脱这个框架，但很难成为主流，现如今需要包容多种视角的方法论。盐出浩之老师从不同角度展现的事例，让我对此前从未想过的事情开始了思考。

关于移动自由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规定了人的移动等问题，盐出浩之老师以日本帝国时期朝鲜人和冲绳人的移动为事例进行了介绍。另外，还以“人的移动能带来什么和能制造什么”为着眼点，介绍了中国和日本移民在夏威夷的关系。简言之，这个报告在国家对人的移动产生强大影响力问题上引发人们思考，也向中国和韩国的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在国史中讲述“人的移动”的问题。通过生动的人物照片，仿佛在他们的人生中看了一部电影。

对此，中日韩三国各派出了2名指定讨论者进行话题讨论。赵阮老师介绍了蒙古帝国时期因经济和政治因素导致的人的移动。赵阮老师指出，在人们的移动日益活跃的过程中，帝国内部也出现了与来自其他文化圈的人之间的竞争，并且他们的移动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影响。

张佳老师也以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移动现象为例做了说明。对战争导致的人口移动与政府主导的强制移动以及没有政府介入的经济移动进行了比较，并展示出人们为维持生计而突破各种限制自发移动的样貌。

榎本涉老师介绍了古代和中世纪日本关于移动的具体事例。古代日本对出入境进行严格管理，而中世纪则没有相应的国家管理，因此想要移动的人需要自行准备起到护照作用的文件。

在上述讨论中，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看出国家试图干预人员流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在当下大流行病的环境中，移动的停止似乎在网络上引发了更加活跃的联系。

韩成敏老师将近代韩国人的移动情况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出于生计考量的半自发移动；第二种是国家政策性移民；第三种是殖民地化以后的强制动员。此外，还指出引入一种具有对弱者关怀的跨民族主义观点的必要性，并在移居国外的流散集团的问题上，提出了移居者集团之间的竞争可能具有特殊性的观点。

秦方老师在介绍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时，提出了对中心和边缘、边缘和边界之外的平衡以及在两者之间穿梭的人的关心的必要性。在国家对移动进行管理的同时，我们也要观察其背后的面貌。秦方老师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领域研究，并讲述了大流行病之后，发生了变化以及没有发生变化的界限里的人物们的故事。

大久保健晴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了人的移动。他举出了历史上为推动现代化进程国家雇用外国人的事例，以及前往南洋群岛的日本人的原住民认知的事例等。对于人的移动问题，观察多个事例甚至相反的例子是非常重要的。如何看待脱离主权国家的难民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外，大久保健晴老师还提出，除了东亚之外，我们还要共享对其他地区的看法。

在以上的指定讨论中，我们探讨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引发人员移动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我们了解了历史中的国家管理方式及其原因，也看到了想要超越这些因素的人们充满活力的样貌。虽然时间很短，但感觉自己的视野被拓宽了。我认为，围绕相同的主题，结合各自的专业领域，简短而明了地谈论问题意识的这个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接下来的环节是指定讨论者参与的自由讨论时间。由南基正老师主持，移动的自发性和非自发性的区分是本环节讨论的核心。盐出浩之老师表示，提出此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个人是出于多种目的而进行移动的。但他的立场是，影响其移动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国家。我们再次确认了国家和个人不是单方面的关系，而是紧张关系。对于是否需要区分移动和移居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还讨论了民族是国家还是民族集团，以及民族集团是否也是在历史中被创造出来的等问题。

第3、4环节是由讨论小组成员参与的自由讨论，讨论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在讨论之前，刘杰老师围绕着是什么规定了移动，移动带来了什么，各国的国史教育如何处理移动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待今天的人的移动等问题整理了论点。得益于此，在自由讨论之前，我们有了整理思绪的时间。

各专业领域的研究者的提问以及论点提出，加深了本次对话的深度。平山升老师提出的“考虑到人的移动，把焦点放在对人类产生普遍影响的宗教上会如何？对于被遗忘的移动也应该给予关注，有必要与普通人的共享问题意识”；大川真老师提出的“自发和非自发可能没有太大差异。‘中动态’的概念，即：虽不是自发的，但是在环境下，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情况”；浅野丰美老师提出的“以人的移动为基轴，描绘全球历史是重要的尝试。通过此次主题，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从古代到

近代的国家社会”；南基正老师提出的“迁移的移民在与当地的关系中产生的问题，移居二代的身份问题”；佐藤雄基老师提出的“移动和劳动力的密切关系”；市川智生老师提出的“在与人的移动密切相关的传染病同现代社会中本国国民的保护形成矛盾的场景中所感受到的疑惑”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本环节的主持人郑淳一老师和彭浩老师详细介绍了自己专业领域中的与中国和日本的护照、户籍等相关的事例，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时代的理解。

讨论时间就这样结束了。接着是宋志勇老师和三谷博老师的总结，以及赵琬老师的闭幕致辞。几位老师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未能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遗憾之情。尽管留有一些遗憾，但大家一致认同本届会议的举办取得了圆满成功。三谷博老师表示，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所从事的许多研究及报告是老一辈研究者从未想过的，从而感受到了东亚的光明前景，希望以后能与在此认识的好朋友们继续引领该对话。

通过第六届国史对话，让我意识到研究不同时代和分类史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谈论共同的主题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提出的问题拓宽了讨论范围，知识的刺激引出了新的疑问。从点到线再扩大到面，讨论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虽然9月11日的讨论时间已经结束，但中日韩三国的对话并未停止。在进行国史对话的同时，各研究人员也可以在自己所属的地方召集“对话伙伴”，扩大“对话场域”。这样想的话，比起遗憾，我觉得更多的是期待。

（金罔泰“第6届国史对话《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报告”转载）

# 新冠疫情下国史对话依然超越 国界与世代

三谷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昨天，第6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研究会议于网上举办。此会议在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的支持下，以打开东亚各国国史研究者之间对话之路为宗旨，自2016年起举办至今。从事国际关系以及邻国史的研究人员通过留学与邻国的人们展开日常对话，但“国史”研究者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为缓解东亚历史自20世纪起持续至今的摩擦，首先需要促进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国史”学者们进行直接对话。经早稻田大学刘杰老师提议，并获渥美财团支持，日中韩三国的历史学家们展开对话，基本保持以隔年一次的频率召开研讨会。

本次会议主题为“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首先盐出浩之老师做了基调报告，之后日中韩三国各自指定的二位学者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小组成员10人展开了约3个半小时的自由讨论。与以往不同，本次会议报告仅有一人，之后全凭与会者现场发挥，可谓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在组委会成员村和明、李恩民、南基正、彭浩、郑淳一等各位老师周到的准备与团体协作下，实现了充分的讨论及话题延伸。三国的中青年历史学家成为本次会议的主力，他们以扎实的史料研究为基础，跨越专业领域积极参与同别国学者的对话，促成了非常精彩的学术讨论。我作为年长者感到非常高兴。

本国史对话项目最初是为消解东亚三国，特别是日本与邻国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摩擦，减轻国际关系负担而启动的。本世纪初，在“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争论焦点时，我与相同世代的历史学家们持续进行对话，至少在历史学家之间，当对方给出不同解释时，都会试图去理解对方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但那之后，东亚各国政府刻意使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历史问题被迫退居其后。结果现在已经失去了讨论20世纪上半叶那段严峻历史的场域。

但是，我又不忍舍弃本世纪初东亚历史学家们的成果。退一步说，至少在学术层面想要为下个世代的历史学家们保留一个日常交流与合作的场域。在学术上，比起让各国历史学家们将自己封闭在本国学术界，这样做的生产率会高得多。此次的国史对话与先前相较虽然有所转向，但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世代更迭的机会。去年1月在菲律宾的会议上新加入的学者们同渥美财团已毕业的奖学生们合作，在新的问题设定下展开行动。今年1月，在充分意识到新冠疫情问题之上特别关注到“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议题，但当时讨论进行得还不够充分，基于这一反思，青年学者们又设定了“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这一议题，开始探讨超越学校教科书中“国史”的历史叙事。

当然，并不是说被关注到的各个主题都被讨论得十分透彻。但其中也有像“过境证明书”这种贯穿古代与近世的讨论议题，我从这些讨论中看到了编著合作论文集的可能性。

现在东亚三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非常严峻，各国舆论中相互敌对的关系，在本世纪初是未曾预想到的。与此同时，本次研讨会向世人展示了还存在与之完全不同的潮流，且其推动者为青年学者。世界并非完全由政治掌控，我期望可以通过学术培育出坚实强韧的联结，能够超越新冠疫情与国家间的敌对关系，为全世界带来助益。而本次会议让这个期望变得更加丰满了。

(短文 684：三谷博“新冠疫情下国史对话依然超越国界与世代”转载。本文为三谷老师参加第 6 届“国史对话”会议后，于次日发布在 Facebook 上的文章。)

第六届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 参加者名单

	姓名 (罗马字)	姓名 (日语)	姓名 (韩语)	姓名 (中文)	所属单位 (日语)
<b>报告人</b>					
1	Shiode Hiroyuki	塩出浩之	시오테 히로유키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b>指定讨论者</b>					
2	Cho Won	趙 阮	조 원	赵 阮	釜山大学
3	Zhang Jia	張 佳	장 자	张 佳	復旦大学
4	Enomoto Wataru	榎本 涉	에노모토 와타루	榎本 涉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5	Han Sungmin	韓 成敏	한 성민	韩 成敏	世宗大学
6	Qin Fang	秦 方	친 광	秦 方	首都師範大学
7	Okubo Takeharu	大久保健晴	오쿠보 다케하루	大久保健晴	慶應義塾大学
<b>自由讨论小组成员</b>					
8	Asano Toyomi	浅野豊美	아사노 도요미	浅野丰美	早稲田大学
9	Hirayama Noboru	平山 昇	히라야마 노보루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10	Ichikawa Tomoo	市川智生	이치카와 토모오	市川智生	冲繩國際大学
11	Nam Kihyun	南 基玄	남 기현	南 基玄	韓國獨立記念館
12	Okawa Makoto	大川 真	오카와 마코토	大川 真	中央大学
13	Sato Yuki	佐藤雄基	사토 유키	佐藤雄基	立教大学
14	Sim Chulki	沈 哲基	심 철기	沈 哲基	延世大学
15	Sun Jiqiang	孫 繼強	순 지치양	孙 继强	蘇州大学
16	Wang Yaozhen	王 耀振	왕 야오젠	王 耀振	天津外國語大学
<b>组委会成员</b>					
17	Chen Lu	陳 璐	첸 루	陈 璐	早稲田大学
18	Cho Kwang	趙 珖	조 광	赵 珖	高麗大学名誉教授
19	Chong Soonil	鄭 淳一	정 순일	郑 淳一	高麗大学
20	Kim Kyongtae	金 キョンテ	김 경태	金 囧泰	全南大学
21	Li Enmin	李 恩民	리 언민	李 恩民	桜美林大学
22	Liu Jie	劉 傑	류 지에	刘 杰	早稲田大学
23	Mitani Hiroshi	三谷 博	미타니 히로시	三谷 博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24	Mura Kazuaki	村 和明	무라 가즈아키	村 和明	東京大学
25	Nam Kijeong	南 基正	남 기정	南 基正	ソウル大学
26	Peng Hao	彭 浩	펑 하오	彭 浩	大阪市立大学
27	Song Zhiyong	宋 志勇	송 지용	宋 志勇	南開大学
<b>同声传译</b>					
28	Ding Li	丁 莉	정 리	丁 莉	北京大学
29	Song Gang	宋 剛	송 강	宋 剛	北京外國語大学
30	Lee Hyeri	李 헤리	이 헤리	李 惠利	韓國外國語大学
31	Ahn Younghee	安 ヨンヒ	안 영희	安 暎姬	韓國外國語大学
32	Jin Danshi	金 丹实	김 단실	金 丹实	通訳翻訳者
33	Piao Xian	朴 賢	박 현	朴 贤	京都大学
<b>翻译</b>					
34	Hong Yongil	洪 龍日	홍 용일	洪 龙日	東京大学
35	Yu Ning	于 寧	유 닝	于 宁	東京大学
36	Yun Jae-un	尹 在彦	윤 재언	尹 在彦	一橋大学
<b>组委会成员 / 工作人员</b>					
37	Imanishi Junko	今西淳子	이마니시 준코	今西淳子	渥美財団
38	Tsunoda Eiichi	角田英一	쓰노다 에이이치	角田英一	渥美財団
39	Nagai Ayumi	長井亜弓	나가이 아유미	长井亚弓	渥美財団
40	Miyake Aya	三宅 綾	미야케 아야	三宅 綾	渥美財団

## SGRA 報告 已发行期号介绍

- SGRA レポート01 設立記念講演録 「21世紀の日本とアジア」 船橋洋一 2001.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2 CISV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挑戦：多様性の中に調和を求めて」  
今西淳子、高 偉俊、F. マキト、金 雄熙、李 來賛 2001. 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技術の創造」 畑村洋太郎 2001.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4 第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の皆さんへ」 関 啓子、L. ビッヒラー、高 熙卓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5 第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の新しい東アジア：経済協力をどう考えるべきか」  
平川 均、F. マキト、李 鋼哲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6 投稿 「今日の留学」「はじめの一步」 工藤正司 今西淳子 2001.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7 第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共生時代のエネルギーを考える：ライフスタイルからの工夫」  
木村建一、D. バート、高 偉俊 2001. 10.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8 第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教育革命：ITは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  
白井建彦、西野篤夫、V. コストブ、F. マキト、J. スリスマンティオ、蔣 惠玲、楊 接期、  
李 來賛、斎藤信男 2002. 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9 第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対話と共生をキーワードに」  
ベマ・ギャルポ、林 泉忠 2002. 2. 2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0 第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とイスラーム：文明間の対話のために」  
S. ギュレチ、板垣雄三 200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1 投稿 「中国はなぜWTOに加盟したのか」 金香海 2002. 7.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2 第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環境診断：地球の砂漠化を考える」  
建石隆太郎、B. プレンサイン 2002.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3 投稿 「経済特区：フィリピンの視点から」 F. マキト 2002. 12. 1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4 第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新しい東アジア」 + 宮澤喜一元総理大臣をお迎えして  
フリー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平川 均、李 鎮奎、ガト・アルヤ・ブートゥラ、孟 健軍、B. ヴィリエガス 日本語版2003. 1. 31 発行、  
韓国語版2003. 3. 31 発行、中国語版2003. 5. 30 発行、英語版2003. 3.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5 投稿 「中国における行政訴訟—請求と処理状況に対する考察—」 呉東鎬 2003. 1.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6 第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情報化と教育」 苑 復傑、遊間和子 2003.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7 第1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21世紀の世界安全保障と東アジア」  
白石 隆、南 基正、李 恩民、村田晃嗣 日本語版2003. 3. 30 発行、英語版2003. 6.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8 第1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研究：国境を越える取り組み」 高橋 甫、貫戸朋子 2003.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9 投稿 「海軍の誕生と近代日本—幕末期海軍建設の再検討と『海軍革命』の仮説」 朴 榮濬  
2003. 12. 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0 第1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環境問題と国際協力：COP3の目標は実現可能か」  
外岡豊、李海峰、鄭成春、高偉俊 2004. 3.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1 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共同体構築に向けての日本及び韓国の役割について」 2004.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2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民族紛争—どうして起こるのか どう解決するか」 明石康 2004.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3 第1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宮島喬、イコ・プラムティオノ 200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4 投稿 「1945年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中国に対する援助：その評価の歴史」 フスレ 2004.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5 第1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国境を越えるE-Learning」  
斎藤信男、福田収一、渡辺吉裕、F. マキト、金 雄熙 2005. 3.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6 第1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この夏、東京の電気は大丈夫？」 中上英俊、高 偉俊 2005. 1. 2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7 第1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過去・現在・未来」  
竹田いさみ、R. エルドリッヂ、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8 第1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地球市民の義務教育-」  
宮島 喬、ヤマガチ・アナ・エリーザ、朴 校熙、小林宏美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9 第18回フォーラム・第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韓流・日流：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における  
ソフトパワー」 李 鎮奎、林 夏生、金 智龍、道上尚史、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雄熙 2005. 5.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0 第1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文化再考－自由と市民社会をキーワードに－」  
宮崎法子、東島 誠 2005. 1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1 第2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雁はまだ飛んでいるか」  
平川 均、渡辺利夫、トラン・ヴァン・トウ、範 建亭、白 寅秀、エンクバヤル・シャグダル、F.マキト  
2006. 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2 第2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留学生－」  
横田雅弘、白石勝己、鄭仁豪、カンピラパーブ・スネート、王雪萍、黒田一雄、大塚晶、徐向東、  
角田英一 2006. 4.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3 第2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の研究」 小菅信子、李 恩民 2006. 7.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4 第2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と宗教：宗教って何なの？」  
島藺 進、ノルマン・ヘイヴンズ、ランジャナ・ムコパディヤヤ、ミラ・ゾンターク、  
セリム・ユジェル・ギュレチ 200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5 第2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ごみ処理と国境を越える資源循環～私が分別したごみはどこへ行くの？～」  
鈴木進一、間宮 尚、李 海峰、中西 徹、外岡 豊 2007. 3.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6 第2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は教育を強化できるか」  
高橋富士信、藤谷哲、楊接期、江蘇蘇 2007.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7 第1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若者の未来と日本語』」  
池崎美代子、武田春仁、張 潤北、徐 向東、孫 建軍、朴 貞姫 2007. 6.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8 第6回韓国フォーラム in 葉山講演録 「親日・反日・克日：多様化する韓国の対日観」  
金 範洙、趙 寛子、玄 大松、小針 進、南 基正 2007. 8.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9 第2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私たちの出会いと将来～」  
黒住 真、韓 東育、趙 寛子、林 少陽、孫 軍悦 2007.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0 第2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アジアにおける外来種問題～ひとの生活との関わりを考える～」  
多紀保彦、加納光樹、ブラチャー・ムシカシントン、今西淳子 2008.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1 第2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いのちの尊厳と宗教の役割」  
島藺進、秋葉悦子、井上ウイマラ、大谷いづみ、ランジャナ・ムコパディヤヤ 2008.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2 第2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新疆講演録 「黄土高原緑化協力の15年－無理解と失敗から  
相互理解と信頼へ－」 高見邦雄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8.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主義」 平川均 2008. 3.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4 第2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広告と社会の複雑な関係」 関沢 英彦、徐 向東、オリガ・ホメンコ  
2008. 6.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5 第3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教育における『負け組』をどう考えるか～  
日本、中国、シンガポール～」 佐藤香、山口真美、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2008.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6 第3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水田から油田へ：日本のエネルギー供給、食糧安全と地域の活性化」  
東城清秀、田村啓二、外岡 豊 2009.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7 第3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オリンピックと東アジアの平和繁栄」  
清水 諭、池田慎太郎、朴 榮濬、劉傑、南 基正 2008. 8.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8 第3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延辺&北京講演録 「一燈やがて万燈となる如く－  
アジアの留学生と生活を共にした協会の50年」 工藤正司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9. 4.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9 第3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が格差を縮めるか」  
東 茂樹、平川 均、ド・マン・ホーン、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09.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0 第8回韓国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韓の東アジア地域構想と中国観」  
平川 均、孫 洌、川島 真、金 湘培、李 鋼哲 日本語版、韓国語 Web 版 2009.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1 第3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テレビゲームが子どもの成長に与える影響を考える」  
大多和直樹、佐々木 敏、渋谷明子、ユ・ティ・ルイン、江 蘇蘇 2009.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2 第3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21世紀の課題」  
宮島 喬、都築 勉、高 熙卓、中西 徹、林 泉忠、プ・ティ・ミン・チイ、  
劉 傑、孫 軍悦 2010. 3.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3 第4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上海講演録 「世界的課題に向けていま若者ができること～  
TABLE FOR TWO～」 近藤正晃ジェームス 2010. 4.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4 第3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エリート教育は国に『希望』をもたらすか：東アジアのエリート高校教育の現状と課題」玄田有史 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金範洙 張健 2010. 5.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5 第3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市・建築のエネルギー事情とライフスタイル～」木村建一、高偉俊、Mochamad Donny Koerniawan、Max Maquito、Pham Van Quan、葉文昌、Supreedee Rittironk、郭榮珠、王劍宏、福田展淳 2010. 12.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6 第5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中国の環境問題と日中民間協力」第一部（北京）：「北京の水問題を中心に」高見邦雄、汪敏、張昌玉 第二部（フフホト）：「地下資源開発を中心に」高見邦雄、オンドロナ、ブレンサイン 2011. 5.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7 第3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ポスト社会主義時代における宗教の復興」井上まどか、ティムール・ダダバエフ、ゾンターク・ミラ、エリック・シッケタンツ、島蘭進、陳継東 2011. 12.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8 投稿「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論への一試論」平川均 2011. 2.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9 第1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1300年前の東アジア地域交流」朴亨國、金尚泰、胡潔、李成制、陸載和、清水重敦、林慶澤 2012. 1.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0 第4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少子高齢化問題と福祉」田多英範、李蓮花、羅仁淑、平川均、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F・マキト 2011. 11.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1 第4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共同体の現状と展望」恒川恵市、黒柳米司、朴榮濬、劉傑、林泉忠、ブレンサイン、李成日、南基正、平川均 2012. 6. 18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2 第6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Sound Economy ～私がミナマタから学んだこと～」柳田耕一 「内モンゴル草原の生態系：鉱山採掘がもたらしている生態系破壊と環境汚染問題」郭偉 2012. 6.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4 第43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講演録「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課題と展望」朴榮濬、渡辺剛、伊藤裕子、南基正、林泉忠、竹田いさみ 2012. 11.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5 第44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講演録「21世紀型学力を育むフューチャースクールの戦略と課題」赤堀侃司、影戸誠、曹圭福、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石澤紀雄 2013. 2. 1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6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日英戦後和解（1994-1998年）」（日本語・英語・中国語）沼田貞昭 2013. 10.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7 第12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太平洋時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新秩序の模索」平川均、加茂具樹、金雄熙、木宮正史、李元徳、金敬黙 2014. 2.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8 第7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ボランティア・志願者論」（日本語・中国語・英語）宮崎幸雄 2014. 5.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9 第45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紛争の海から平和の海へー東アジア海洋秩序の現状と展望ー」村瀬信也、南基正、李成日、林泉忠、福原裕二、朴榮濬 2014. 10.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0 第4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インクルーシブ教育：子どもの多様なニーズにどう応えるか」荒川智、上原芳枝、ヴィラーグ ヴィクトル、中村ノーマン、崔佳英 2015. 4.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1 第4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科学技術とリスク社会ー福島第一原発事故から考える科学技術と倫理ー」崔勝媛、島蘭進、平川秀幸 2015. 5.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2 第8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近代日本美術史と近代中国」佐藤道信、木田拓也 2015. 10.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3 第1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第4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経済のダイナミズムー物流を中心に」李鎮奎、金雄熙、榎原英資、安秉民、ドマンホーン、李鋼哲 2015. 11.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4 第4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円卓会議「日本研究の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求めて」劉傑、平野健一郎、南基正 他15名 2016. 6.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5 第50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北九州講演録「青空、水、くらしー環境と女性と未来に向けて」神崎智子、斉藤淳子、李允淑、小林直子、田村慶子 2016. 6. 27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6 第9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フフホト&北京講演録「日中200年—文化史からの再検討」  
劉建輝 2020.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7 第15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これからの日韓の国際開発協力—共進化アーキテクチャの模索」孫赫相、深川由紀子、平川均、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1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8 第51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今、再び平和について—平和のための東アジア知識人連帯を考える—」南基正、木宮正史、朴栄濬、宋均營、林泉忠、都築勉 2017. 3. 2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9 第52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  
劉傑、趙珖、葛兆光、三谷博、八百啓介、橋本雄、松田麻美子、徐静波、鄭淳一、金キョンテ  
2017.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0 第16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韓の国際開発協力—新たなアジア型モデルの模索—」  
金雄熙、李恩民、孫赫相、李鋼哲 2017. 5.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1 第56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人を幸せにするロボット—人とロボットの共生社会をめざして第2回—」  
稲葉雅幸、李周浩、文景楠、瀬戸文美 2017.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2 第57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2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蒙古襲来と13世紀モンゴル帝国のグローバル化」  
葛兆光、四日市康博、チョグト、橋本雄、エルデニバートル、向正樹、孫衛国、金甫枕、李命美、ツェレンドルジ、趙阮、張佳 2018.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3 第58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を結ぶ? 『一带一路』の地政学」  
朱建栄、李彦銘、朴栄濬、古賀慶、朴准儀 2018. 11.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4 第11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からみた中国美術史学」  
塚本磨充、呉孟晋 2019. 5. 1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5 第17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北朝鮮開発協力：各アクターから現状と今後を聞く」  
孫赫相、朱建栄、文昊鍊 2019. 11. 2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6 第59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3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7世紀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戦乱から安定へ—」  
三谷博、劉傑、趙珖、崔永昌、鄭潔西、荒木和憲、許泰玖、鈴木開、祁美琴、牧原成征、崔姪姫、趙軼峰 2019.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7 第61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の高等教育のグローバル化!?!」  
沈雨香、吉田文、シン・ジョンチョル、関沢和泉、ムラット・チャクル、金範洙 2019. 3. 2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8 第12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映画交流の可能性」  
刈間文俊、王衆一 2020.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9 第62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が世界を変える時…? —不都合な真実を超えて」  
ルウェリン・ヒューズ、ハンス・ヨゼフ・フェル、朴准儀、高偉俊、葉文昌、佐藤健太、近藤恵  
2019. 11.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0 第63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4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東アジア』の誕生—19世紀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の転換—」  
三谷博、大久保健晴、韓承勳、孫青、大川真、南基玄、郭衛東、塩出浩之、韓成敏、秦方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1 第13回SGRA-V カフェ講演録「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の東アジア」  
林泉忠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2 第13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国際日本学としてのアニメ研究」  
大塚英志、秦剛、古市雅子、陳夔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3 第14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西思想の接触圏としての日本近代美術史再考」  
稲賀繁美、劉暁峰、塚本磨充、王中忱、林少陽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4 第65回SGRA-V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5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9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感染症の流行と社会的対応」  
朴漢珉、市川智生、余新忠 2021. 10. 0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5 第19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岐路に立つ日韓関係：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か」  
小此木政夫、李元徳、沈揆先、伊集院敦、金志英、小針進、朴栄濬、西野純也  
2021. 11. 1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7 第67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誰一人取り残さない』如何にパンデミックを乗り越えSDGs実現に向かうか—世界各地からの現状報告—」  
佐渡友哲、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杜世鑫、ダルウィッシュ・ホサム、李鋼哲、モハメド・オマル・アブディン 2022. 2.10 発行

■ レポートご希望の方は、SGRA 事務局 (Tel : 03-3943-7612 Email : sgra@aisf.or.jp) へご連絡ください。

SGRA 报告 No. 0096 (中文版)

---

第66届 SGRA论坛

第六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

编辑·发行 公益财团法人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邮编 112-0014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 3-5-8  
电话: 03-3943-7612 传真: 03-3943-1512  
SGRA 网页: <http://www.aisf.or.jp/sgra/>  
电子邮件: [sgra@aisf.or.jp](mailto:sgra@aisf.or.jp)

发行日 2022年9月30日

发行人 今西淳子

中文版监修 于宁

印刷 (株) 平河工业社

© 关口全球研究会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关于本刊的文章内容, 如有疑问或欲引用请与我们联系。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pying is Prohibited. For inquiries or quotes, please contact us.

SGRA REPORT

SGRA报告 中文版

NO. 96

第66届SGRA论坛

第六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

